

1503

14

臨淄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輯

87

稷下學宮專輯

政協淄博市臨淄區委員會

临淄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稷下学宫专辑

12145/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淄博市临淄区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书名题字：刘子章

封面设计：齐新民

临淄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稷下学宫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淄博市临淄区委员会编

淄博市临淄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七年八月

稷下学宫专辑

目 录

- 引言..... (1)
- 稷下学宫.....王志民 (15)
- 稷下学宫的建立和昌盛.....张福信 (27)
- 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和历史作用
.....董治安、王志民 (39)
- 齐学、鲁学与稷下学宫.....蔡德贵 (57)
- 稷下学派简述.....刘绍华 (74)
- 稷下学宫遗址考略.....李剑、张龙海 (91)
- 稷下学讨论会综述.....郑杰文 (104)
- 《稷下赋》释析.....宋玉顺 (116)
- 祭酒荀卿及其教育思想.....宋玉顺 (129)
- 淳于髡其人其事.....王德敏、周立升 (139)
- 爱国志士王蠋.....宋玉顺 (163)
- 稷下人物小传.....王玉江、刘文熙 (167)
- 编后..... (189)

引 言

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它宛如簇簇晨星闪烁着文化的光芒；它又似道道曙光为学术思想带来了蓬勃灿烂的景象。这就是我国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互相讨论自由争辩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时，齐国的稷下学官，正就是这个光辉局面最为具体的显现。

稷下学官，是战国时期齐国容纳各个不同学派，进行学术思想自由研究讨论，参与政治议论，备齐王咨询、顾问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机构。它具有今日国家科学院、研究所和政府的议院、国家元首的“智囊团”的这些特点。它不但为齐国的政治和学术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对当时的列国和后世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稷下学官，它是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祖国的文化做出了综合整理、融

会贯通的工作，形成了祖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合体。《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诸子一百八十七家的四千余篇书籍中，就有不少篇章出自稷下学士之手。但它的本身却伴随着齐国的灭亡而结束。也同齐国的命运一样，首先遭到的就是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破坏，继而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因而，它为后世留下来的东西比当时的成果要少得多。复因年代久远，零落散佚，在今日研究这个有著广泛领域的齐文化，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也有其一定的难度。现在为使人们知其梗概，除邀集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稷下学宫的建立和昌盛，以及它的内涵和政治作用做探讨性的论述，出刊本辑，以为研究齐文化的发轫点，并希望“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借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今后齐文化的研究、整理工作，起一点推动的作用。

—

齐国（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二二一年），自太公始封，至秦灭齐，约八百余年。这期间出现过不少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工作的开创、传播者。总的说，首先是

开国的姜太公，他奠定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根基；再就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创造了煌煌大业。这是两位最为杰出的人物，其他莘莘大者，亦复不少。

姜太公，辅周灭商，功业彪炳，他“修德政以安内”（《说苑·地理》），“迁九鼎，修国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都是正史对他功业的肯定。他因功封于齐，到齐后，他因地制宜，简化礼仪制度，尊重当地居民的旧有风俗，齐国滨海，就发展渔业和盐业，又大力提倡手工业和商业。即所谓：“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显示了他“治天下有余智”的超人才能，周公曾为之赞叹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因之“海（东海）岱（泰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为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齐始终国力强盛，在春秋

时期能够首先称霸，战国时期也是七雄之一。

太公又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军事家，中国最早的兵书《六韬》，据说是太公所著，而被称为兵学的鼻祖。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奉文王遗命，尊太公望为师，称之为“师尚父”，他在牧野一战，以弱制强，以寡击众，消灭了称雄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商代。所以被称赞说：“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尊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诗经·大雅》中《大明》一篇，就是描写和赞颂太公“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当时指挥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况。

管仲任政，辅佐齐桓公，进行了全国政治改尊，“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法，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管晏列传》），他分国都为十五个士乡和六个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更设有选拔人才制度，以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并用官府力量，发展鱼、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

币，调剂物价，从而国力大振。他“以区区之齐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六亲固。四维不张（《管子》曰礼、曰义、曰廉、曰耻），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合顺民心。”在政令上主张“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确立了桓公称霸的条件，而且“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都是孔子给他的高度评价。

晏婴，《史记·管晏列传》“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对当时的政治风气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改造作用。孔子在齐，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他反对孔子迂阔，繁文褥节，认为用孔子的办法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他所谓“细民”就是平民百姓，一

切要为平民百姓着想，所以他在庄公被杀时，表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点。他的轶事很多，有《晏子春秋》一书传世。

另外，田穰苴，晏婴荐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因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齐威王时，“用兵行威，大放（行）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述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称《司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宏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孙武子，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正义》魏武帝（曹操）云：

“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孙子兵法》在军事学史上地位极高，在公元七世纪时传到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又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现在还是军事学的经典著作，内容包含着相当高明的辩证思想。孙武子的后子孙孙臆，亦有孙臆兵法传于世。这几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均出自齐国，而囊括了我国军事学的权威著作，影响于古今中外。

文化方面，堪以称道者，亦复不少。如孔子于公元前五一七年来到齐国，听到当时几近失传的“韶”乐，以致废寝忘餐“三月不知肉味”，而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中国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曾选录了齐国民歌十一首，称为《齐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到鲁国观乐，他听了各国的民歌演奏，都一一做了评论，他听了《齐风》的演奏后，称赞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从季札的评论中，我们知道《齐风》旋律优美，气魄深远宏大，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的明朗、豪壮特色，所谓“审乐以知政”，因之，得出“国未可量”的结论。元怪，大史公在《史记·齐太公世家》的总评中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威，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二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时代。政治、经济、军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统治阶层由新兴的封建势力所取代，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新的国家，齐国的田姓大夫也篡夺了姜姓的王位。原来世袭的大臣，也被聚财养众拥有实力的下属所代替，整个社会阶级紊乱了，传统的政治道德，伦理法则也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了。在思想意识方面，新的认识层出不穷。国与国之间，征战频仍，民不聊生，陷于政治、军事上的极端混乱。占据王位的和有野心的大臣，为了巩固他们的既得权位和维护他们的现实利益，不得不笼络人才培植势力，因而形成了“好客”、“好士”的风气，这样“尚贤”的要求提出来了，尚贤就是推尚贤才，唯才是用。在春秋中期以前，所谓尚贤、举贤，也只限于贵族集团内部，即“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孔子率先提出了“选于众”（《论语·颜渊》）、“举贤才”（《论语·子路》）、“举逸民”（《论语·

尧曰》)的政治主张，墨翟也相继主张“尚贤”(墨子·尚贤上》)。这样凡是有才智本领的人，不论出身贵贱，都可以平步青云受到重用，出现了一个大家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的大解放时代。这些有才能被选用的人，当时都统称为“士”。本来士是封建制度里最末的一级，但这时候，“士”就成了有才能的人的称号了，并发展成了一种自由职业。以后他们居然开门授徒，扩张声势，除了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又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来议论当时的文化和制度。因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百家就是这样兴起的。这就促进了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空前活跃的时代。也就是我国学术史上所说的“百家争鸣”。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兴起，并且具体显现了这一境况。

三

百家争鸣，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辩的盛世。在秦始皇建立了大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后，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除了“车同轨，书

同文”一切制度的统一外，随之要求政治思想的一致，首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继之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学术思想和社会发展也因之陷于停滞。直到一九一九年，才有北京学术界的“五四”运动发生，倡导“新文化”，大声疾呼民主与科学，但争取学术自由的要求，终未得到实现。

建国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同志的居所颐年堂开会，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这项决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体制的改革这个关系我国人民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的战略方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形势。今天，我们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来研究、整理那象征着“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给我们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它的影响与作用，实有着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

历史学这门学科，现在也和其他学科一

样，面临着怎样适应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怎样满足社会需要问题。历史学能够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似乎不太明显，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来精神与物质两者是相互融通很难截然分开的，有些东西表面看是属于物质的，但其内涵则有绝大部分是精神的产物。很明显的象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家所熟知的。其他如人民的道德修养和审美观念，创造和发明等等，都可以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借鉴。一个国家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知识爆炸，信息畅通，各种学科多向联系的现代社会，文史研究决不可能停留在孤立的状态，而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方法。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整理工作，除了采取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之外，还应该适应新的形势，采取新的方法。

首先是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的结合。过去的历史学者，研究先秦史时，大多重视文献史料，而忽视地下出土的文物；而许多研究古文物的学者，又往往受旧金石学的影

响，不能结合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样就不能使出土文物与文献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以研究战国时代的历史来说，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是《战国策》一书，这固然是由于它有其他资料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但终究它还是有些不足之处，如当秦始皇下令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大量的六国史料随着秦始皇的一炬而灰飞烟灭。《战国策》一书，所收集的只能是一些倖免于难的断简残篇，一直到西汉末年刘向综理编订时，已经是过了将近两百多年，到宋代该书已有缺佚。所以战国时代的史料，能流传到今天的十分有限。从司马迁的《史记》看，就很明显地看出他在这方面史料的贫乏。以后甲骨文和金文的出土，才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填补了只凭文字记录研究的缺陷。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了大量的出土实物，如一九七二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书残本，如《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臆兵法》）、《晏子》（即《晏子春秋》）、《六韬》（即太公《六韬》）等原为后人怀疑的古书，获得

了有力的佐证，并且有些是长期失传的重要佚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最古的抄本，这些自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临淄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西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器铭文等实物。这样，出土文物的历史资料对古籍研究整理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相信，我们对齐文化的研究整理，这样地配合起来，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成就。

再就是采取搞活与开放的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全面改革，首战告捷，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研究整理历史资料、繁荣学术、丰富理论，也应该采取搞活和开放的方法。学术和理论的搞活，就是解放思想，开阔思路，大胆探索，自由讨论；学术和理论的开放，就是了解多方面学术和理论的新信息，不闭目塞听，注意输入，顺应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不时吸收新的东西来充实、丰富已有的理论。通过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和争辩；通过事实证据，求取真理，这样真理才会愈辩愈明，理

论才能因之而丰富而发展。譬如《孙子兵法》，已作为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学术界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被运用于现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实践上。“商战如兵战”，融通信息，分析行情，用计设谋指挥生产竞争，“兵贵神速”、“决胜千里”和商战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实在都有些相通之处，这就是一个学术思想搞活运用的例证。

总之，历史学的繁荣兴盛——齐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既离不开社会的条件，也要靠广大史学家的努力。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只要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求实精神，就必定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果，使“古为今用”，给旧的文化赋以新的精神面貌，并让它发扬光大，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一九八七年八月

稷下学宫

王志民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在其都城临淄建立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学术中心，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发展概略

从现存历史资料探讨，稷下学宫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兴办于田齐桓公（田午）之时，随齐威王的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发展壮大，至齐宣王时视为鼎盛，湣王后期一度衰落，襄王时再度中兴，齐王建时逐渐衰败，及秦灭齐，学宫结束。由始至终，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所罕见。

稷下学宫始建于何年，正史并无是项记载。东汉末学者徐干（建安七子之一）在其

著作《中论》中写有：“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因此，后人多以学官创建于齐桓公（午）之世。桓公在位十八年（公元前三七四年至公元前三五七年），这时，田齐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稷下学官也属草创，发展规模不会太大。桓公之子齐威王在位三十七年，他在政治上，广开言路，整顿吏治，锐意改革。结果，国家振兴，经济繁荣，出现大治景象。与此同时，威王采取开明的文化政策，发展稷下学官，广泛招纳贤士，国内外学者纷纷来稷下讲学，形成初步兴旺的局面。刘向《新序》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以为设以微辞，邹忌必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邹忌为齐相，正是威王之时。由此可见，这时稷下先生已相当多，且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对国家政治产生很大影响。

稷下学官发展的高峰是齐宣王时，（公元前三一九年至公元前三〇一年），这时，齐国富兵强，达到鼎盛时期。宣王也雄心勃勃，“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

夷”（见《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着这种政治的需要，宣王不惜化费大量资财，扩大学宫规模，建筑高门大厦，又实行宽厚的政策，鼓励百家争鸣。《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很多宣王与稷下学会见、议对、辩论、宴请、馈赠的事迹，都足以证明“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史记·田齐世家》）。于是各国来讲学、游学的学者及弟子络绎不绝，人数多至数千人。各派学者在这里开展各种讲学活动和学术论争，稷下成为闻名于各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百家争鸣的园地。

齐湣王（公元前三〇〇年至公元前二八四年）继宣王之后当政。其初期，稷下学宫仍很兴盛，并有继续发展扩大的趋势。但湣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对内不任贤才，对外用兵不休，而且拒绝稷下先生的劝谏，使他们很感失望，慎到、接子、荀况、田骈等著名学者纷纷离开稷下，乐毅率五国之兵攻入临淄，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杀害，学宫也遭到破坏而停顿。

湣王之子襄王（公元前二八三年至公元

前二六五年)在莒即位为齐王,随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而复国,还都临淄。于是学宫重新恢复,又招聘一些著名学者来此讲学,著名大儒、教育家荀况就曾三为祭酒。这时的学宫,虽不能象威、宣之世的兴盛,但仍能恢复原貌,保持旧时传统,算作稷下的“中兴”。

襄王死后,王建继位,在位四十四年。这个时期,齐国在政治上保守退让,毫无作为,学宫也今非昔比,由盛而衰,每况愈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以强大兵力吞并齐国,稷下学宫与国并亡。

总观,稷下学宫从创立到消亡,前后历六代,影响遍及列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对战国中、后期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二、学宫的教育活动及特点

作为战国时期的学堂,与后代的学校相比较,稷下学宫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其主要表现在:

(一) 它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的特点。首先,建有交通方便、规模宏大的校

舍。《史记·孟荀列传》说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可见，为建校舍，齐统治者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而将其建在交通干道旁边，并且府第壮丽。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并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据《孟子》载：先生孟子曾“从者数百人”，《战国策》则记田骈有“徒百人”，由此可以想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里所谓“期会”，就是定期集会，这说明学校有一定的教学日程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师生共聚，或讲演、或辩论、或授课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再者，学宫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守则，《管子·弟子职》篇就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其中写道：“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谓学则。”这里从饮食起居到衣着装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

都规定得详细缜密，井井有条。从此一斑，可以窥见当年学宫的规章制度是严肃的、齐全的。

(二) 学宫具有后代学校不能俱备的独特的历史特点。

第一，游学是其主要教学方式。所谓游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二是老师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方面的充分自由。从学生方面讲，游学又分个人游学和集团游学。如荀况十五岁即从赵国来稷下游学寻师，学一段时间后又自由离去，是个人游学。孟子率弟子数百人一块来稷下游学，走时又跟从孟子一块离去，这即是集团游学。而不论哪一种形式的游学，齐国统治者都表示欢迎，来的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概不阻挠。离开后再想回来的，不计前嫌，仍然欢迎。例如，孟子曾经二进二出稷下，都同样受到热情迎送。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即使跟随先生来游学的弟子，入学宫后，也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学习，其他学派的先生讲学也可以听，所以学生在稷下学习期间，思想往往发生重大的变化，甚至尽弃旧学而接受

新学说。这种灵活的游学制度，就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兼收并蓄，扩大见闻，打破私学局限，促进各种思想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二，为政治服务是其根本目的。齐国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有其明确的政治企图，这就是：一是吸收和培养人才，以便为国家选贤任能。二是利用稷下的讲坛，为巩固其统治，实现统一中国大业大造舆论，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刘向的《新序》记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这都说明稷下的讲坛是以议论、讲授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为主的，稷下先生们撰写讲稿，著书言说，是着眼于政治的需要，力图投合“世主”的胃口。与这种办学目的相一致，稷下的学宫，还往往亲自参与国事的商讨，直接投入国家的政治活动，既是“教书先生”；又是“政治中人”。这就使稷下这个学堂兼有了政治机构的性质，被后人称为：“政治参议院”；齐国政府的“智囊团”。从现有历史记载看，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出谋划策，劝谏国君。例《战国策·齐策三》载，稷下先生淳于髡在齐欲伐魏的关键时刻，及时向齐王分析形势，说明出师的不利，从而制止了一次冒险行动。他还当面批评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独不知“好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这种谋臣和谏官的角色，是很明显的。桓宽《盐铁论·论儒》有齐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的记载。“诸儒”即指稷下先生，这说明稷下的学者对齐国的政治有强烈的责任感。

2、奉命执行外交任务。刘向《别录》“齐使邹衍过赵。”《战国策》载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许多稷下先生往往又是出色的外交活动家，他们在关键时刻，常能力挽狂澜，挽救齐国的危亡或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3、为齐国统一天下准备各种典章制度。终战国之世，齐国始终为霸强之一，与秦、楚成鼎足之势。统一天下，是田齐几代国君梦寐以求的愿望。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期正是“齐最强于诸侯”的宣王之世，齐宣

王雄心勃勃，要“莅中国而抚四夷”，稷下先生就担负起齐建立统一帝国后各种典章制度的设计准备。据有关专家考定，稷下先生所编著的《王度记》、《周官》、《管子》等，即是这类著作。

4、整理古籍，为齐国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稷下学宫作为学者荟萃的文化教育中心，曾经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可惜大多散佚了。经稷下先生收集、整理的《管子》、《晏子春秋》、《司马兵法》、《考工记》等，即分别是对古代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经验的总结。

第三，百家争鸣是其基本特征。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了齐明的文化教育政策，稷下学宫不仅是个大学堂，而且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园地。各种思想流派的学者都聚集在这里，发表自己的见解，展开激烈的辩论和争鸣。这种百家争鸣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一，学派林立，各家平等。据有关历史记载，稷下的主要学派和代表人物有：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彭蒙、田骈、环渊、慎到等；法家：慎到；阴阳家：邹衍、邹奭；名家：儿说、田巴。另外还有墨

家、兵家等等。几乎当时社会上的所有学派，稷下都存在过。由于当时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往往出现派中有派，派中分枝的现象，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即是指的这种情况。例为：学宫中儒家分为：孟子派，荀子派；道家分为：宋钐、尹文派，田骈、慎到派和环渊派。同时，各学派的思想也由于百家争鸣的深入而逐渐发展和演变。例如，慎到由道家变法家，而成为法家的先驱。这些各家各派的学者，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学说，却都能各尽所能，利用稷下的讲坛，传播思想，广收徒属，扩大影响。而齐统治者则只为他们的教学、争鸣提供有利条件，而不在政治上施加特殊限制，同时，也不以齐统治者的好恶，独尊所好，排斥、压制异己。所以，各家都在稷下有一定地位。同时，在百家共存条件下，开展学术上的自由竞争，使任何一家只能暂时取得相对优势，而不能在稷下占永久的统治地位，而各学派为了避免淘汰，适应竞争，都积极发展自己的思想，于是，共同创造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其二，形式多样，辩论自由。各个学派的学者为

要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得到社会公认，都要利用稷下的讲坛，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而这种辩论的形式，在稷下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个别进行的，也有大规模公开进行的。有先生与先生的辩论，也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先生的辩论。这种大辩论开始的时候，各学派都以己说为是，以他说为非，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而经过自由辩论，各家往往取长补短，打破门户之见，既有批评，又有吸收，这样，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发展了教育。

第四，待遇优厚是其兴旺基础。稷下学宫发展成为列国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历一个半世纪而不衰，除政策开明，学术自由以外，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知识分子”以优厚的特殊待遇是另一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在政治上给“知识分子”以很高的地位和荣誉。齐宣王时，曾先后挑选各派学者七十六人“皆赐第为上大夫”，还有许多人被封为列大夫，而淳于髡、孟子等稷下领袖人物，则更被齐王加封为上卿、博士等，朝夕请教，不离左右。更值得称道的是，为减轻“知识分子”负担，让他们“不治而议论”，

也就是说，虽授官职，却不处理日常政务，专门从事议论、研究。其次，在生活上给创造优裕条件。学官建在交通干道旁，极利于学者的往来；从齐威、宣王开始花费大量资财，建设学宫，为成百上千的师生解决住房问题，凡属高级学者，均受特殊优待，住进“高门大屋”，其余也按级别居住宽敞住房，宫内建有厅堂，供学者集会和讲学，这种优惠的住房政策，为当时列国所仅见。稷下学者的俸禄，史载不详，但从田骈在稷下讲学，曾得“赏养千钟”的历史记载看，他们的薪俸一定很高。齐王为招聘人才，吸引学者，不惜高薪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作者：王志民同志，淄博师专副教授

稷下学宫的建立和昌盛

张福信

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开设了稷下学宫，聚集了许许多多著名学者，展开了学术的自由争辩，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稷下学宫在齐国故都临淄之所以建立和昌盛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经济、政治、思想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姜尚封齐时，“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开始有了手工业和鱼盐之利。齐桓公小白，任用管仲，“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创）用之。”废除了井田制，积极发展工商业，“通齐国之鱼盐于东海，使关市讥而不征。”（《国语·齐语》）同时，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工具逐步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使生

产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因而桓公时期齐国的经济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学术讨论研究的风气也应运而生。

田氏代姜之后，仍然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齐威王听从稷下先生的劝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烹了贪赃行贿的阿大夫，奖励了勤于政务，严于管理的即墨大夫，致使齐国“大治”。而稷下先生们也关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他们鼓吹土地私有，强调农业要增产，必须深耕土地，多施粪肥。到了齐宣王时期，齐国经济终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战国策·齐策》引苏秦的话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里虽不免有夸张之词，但齐国的富强，临淄的繁华，是客观存在的。

当时，齐国的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不仅有从临淄直达荣成的横贯齐国的东而大道；而且有临淄西经平陵，南出古阳关，而

达兖州的要道；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日照与吴、越交往的大道；有临淄经济南、平原达赵、卫的交通要道；还有从临淄南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交通要道等等，这些道路交通的建设不独为各国的朝聘交往、经济贸易创造了条件，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

二、政治的迫切需要。田氏政权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的，是非常不易的。公元前七六二年，陈国厉公之子陈完因内乱逃往齐国，充当工正之职，齐景公当立时，齐国发生内乱，陈、鲍家族打败了栾、高家族，且侵吞了他们的家产。陈无宇将所得财物上献景公，下赠诸位公子，并以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借贷贫民，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后来，田常充任相国，对内对外采取松动、和缓的政策。到他的儿子田和时，终于把齐康公流放海上，进而取代为诸侯王。从陈完逃齐，到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请求为诸侯王，经历了二八六年的漫长岁月。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统治地位，田齐政权伊始，就很注重文人学士的作用。徐干《中论》云：“齐桓公田午立稷下

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田齐桓公午尊宠贤人是要他们制造舆论，宣扬田氏代姜的合法性。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者也”（《孟子·梁惠王章下》）。正是田氏取代姜氏所需要的藉口和理论根据，颇适合田氏统治者的口味。同时，田氏统治者还要利用学士们的活动，铲锄滋生新的篡权者的思想土壤。

齐威王继位后，雄心勃勃，不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要称王天下。他铸鼎声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田午）恭哉，大漠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迹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民国九年纂修的《临淄县志》）。这里，齐威王把自己称为黄帝的后裔，不仅继承齐国王侯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造而向统一中国的目标前进。为此，他一方而重用孙臆、田忌于公元前三五年和三四一年进行了桂陵、马陵之战，打出了国威，取代魏而称霸东方；一方而广招人才，为他统一中原奠定基础。他在与魏王论国宝时表白说：“我与你对国宝的看法不同，我看中的是人才而不是珠宝。”齐威

王看重的人才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够出谋划策的稷下先生。齐宣王继承了齐威王的事业，随着齐国的日益强盛，他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的雄心也愈来愈大。当西方的秦国实行改革，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也不甘心落后，借燕国发生内乱，发兵干涉，只用了五十来天的时间就直达燕国国都，扩大了齐国的疆域和影响。然而，要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做下去。因此，齐宣王更加注意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喜文学游说之士”，说：“寡人忧国爱民，因愿得士以治之”（《战国策·齐策》）。不惜耗费资财，招揽各派学者“数百千人”于稷下学官。稷下学官由此进入了昌盛发展的时期。

三、良好的思想传统。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一开始就有所不同。齐基本上沿用了当地的习俗，鲁则把西周的习俗几乎全盘搬到了鲁国。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他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

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姜尚是有见地的。他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措施，并没有把西周王朝的那一套礼仪教条主义地搬到齐国。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这种因地制宜，从当时当地实际出发的思想，在齐国得到发扬光大。管仲曾说：“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由此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正确主张。春秋时代的“俗”是正在变革中的俗，是顺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萌芽成长趋势的。尔后，当信奉周礼的孔子向齐景公提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时，就遭到相国晏婴的强烈反对。他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可见，齐国的传统思想是比较解放的，政治气氛是比较活跃的，学术活动是为变化着的时局服务的。

就田齐本身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通于世变思想的广泛传播，是难以取姜氏而代之以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由于燕国这方面思想基础薄弱，不仅引起举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而且招致齐军大举入侵，燕国民众又立太子平为昭王，恢复了固有的统治地位。七国之中，唯独田氏篡权而稳定自己的统治，不能不说与齐国的传统思想适于世变是有密切关系的。汉高祖初时齐人学士叔孙通要帮助汉高祖制定一套朝仪，以安定朝廷秩序。他曾动员而名鲁国的儒生参与，但鲁生却以“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公所为不合古”而斥责叔孙通，而叔孙通却嘲笑鲁生“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正是由于齐地之学风近乎趋时，喜于新意的思想影响下，致使归属于儒家的荀卿，也不纯其为儒家，而是吸取了诸家的精华，显得非常庞杂。他甚至把儒家学派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斥为俗儒，对子思、孟轲也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只有在这样一种风气下，才允许各学派各抒己见，展开争鸣，这就是别于他国，周秦诸子独在齐国形成盛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适宜的方针政策。首先，对稷下学士齐国政府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田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时，就把贤者尊宠为大夫之号。而稷下学宫兴盛时的齐宣王更是“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对稷下学宫比较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仅给予相当于上大夫之职的崇高荣誉，而且鼓励学士们评论国事，提出建议，把他们视为治理国家的“智囊团”。

其次，生活上给学士们以优越的条件。齐国政府给稷下学士们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郭沫若说：“这些学者们得到了这种温暖的保护，也真好象在春雨中的蘑菇一样，尽量地簇生了起来。”他们“既无事务工作拖累，用不着坐办公厅，有好房子住，不愁穿，不愁吃，还有很多人服侍，这还不好让脑细胞的活动充分向形而上学的方而发展吗？养者与受养者两得其所，于是乎道家思想也就蓬蓬勃勃地兴盛起来了”（《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

批判》)。

其三，对各家学派来者不拒，允许“士无定居。”齐国政府对各派学士都是欢迎的，就其学派来讲，可以说稷下之学五花八门，济济一堂。田骈、慎到、接子、宋钐、尹文是道家；孟轲、荀卿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鲁仲连、淳于髡“其学无所主”，实际上是博学家；首先提出“白马非马”、“服齐稷下之辩者”著称的儿说和田巴是名家，等等。就说道家吧，也分化为宋钐、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环渊为一派。

由于诸侯林立，各学者为了推行学说到处游说，到处奔波，齐政府非常适应这种形势，采取了来去自出的政策。比如，孟轲到齐国去，宣扬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与淳于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看到自己的学说不能在齐实现，索性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为道不为富，坚持要走，齐宣王挽留无效，最后以礼相道。淳于髡、宋钐、尹文、鲁仲连、邹衍等到各国游说，推行自己的主张。荀子也曾到过秦国，后来，荀子死在楚国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其四，在学术上实行取长补短，自由争辩，不治而议论的方针，使得众多学士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著书立说，批评时政。稷下的学士们在争辩中，也注意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达到弄清是非的目的。荀卿提出“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四骈、邹衍、邹奭、淳子髡、田巴、鲁仲连等都是雄辩家。孟轲曾慨叹道：“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卿更是对老子、庄子、申子、环渊、慎到、季真、魏牟、惠施、邓析、宋钐、墨翟、陈仲、史猷、吴起、商鞅等学官内外的学者一一进行了批判。在辩论中，学士们注意互相学习，努力做到“兼听齐明”、“兼论公察”，而不是“唇枪舌剑”。荀子说：“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这种良好的风气，使稷下学宫成了繁荣文化思想的自由讲坛。

稷下之学得以在齐国昌盛是有其多方面的因素的，是较之其他六国有着优越条件的。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但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比较落后，思想比较保守，只是到了公元前三六一年秦

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之后，才逐渐成为大国，强盛的历史较晚，难以形成文化的中心。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了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出现了屈原、宋玉等著名诗人，但由于秦、楚接壤，战争频繁，又缺乏相应的机构设置，学者难以云集。燕国比较弱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才有所强大。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比较落后。赵国与匈奴为界，与齐濒临，局势动荡。这些国家均不具备在战国混战期间，形成文化中心的客观条件。魏国曾一度强盛，公元前四二四年魏文侯即位，他曾学儒术，著书六篇，尊敬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门豹、李悝、乐羊及大军事家吴起，在诸侯中最有声望。但是经过桂陵、马陵之战之后，一蹶不振。魏国向齐国屈膝，这就是说，稷下学宫在齐国建立至昌盛，是有着独特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它从兴盛到圯废，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公元前二八四年燕昭王命乐毅破齐，临淄失守，大片土地为燕所占，稷下之学与百

家争鸣的热烈场面由于战乱而破灭了，齐国也随之败落下来，丧失了足以与秦相抗而争雄的地位。

作者：张福信同志，中共淄博市
张店区委书记

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和历史作用

董治安 王志民

一、从“稷下”的地理位置说起

“稷下”一名，始见于《史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提到“齐稷下学士”《孟子荀卿列传》又称邹衍等为“齐之稷下先生”。刘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唐司马贞《索隐》也说：“稷下，齐之城门也。或云稷下，山名，谓齐之学士集于稷门之下。”可见稷下就是指在稷门之下，而稷门则是齐国都城临淄的一个城门的名称。

然而，据历史考证临淄城四方有十三个城门，上述“谈说之士”所期会的稷下，究竟为哪一方哪一处城门之下呢？自古及今，于此约有两说：一说为齐城的而门。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条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而门也。外有

学堂，即齐宣王之学所也。”（按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九六一年六月科学出版社版。引此段文章出处为“《太平御览》卷十八益都条下引刘向《别录》”实误；又其所引“即齐宣王所立学官也”一句，文字亦有衍误）。又《索隐》引《齐地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址）往往存焉。”今人不乏有从此说者。如《辞海》（修订本，一九八〇年版）“稷下”条，就称“稷门”是临淄城的“西边南首门”。又一说为齐城的南门。此一说由于《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发表，而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我们经过认真地考索，认为后一说是正确的，前一说是不对的。下而谨就我们的初步考索，结合《勘探纪要》提供的资料，做综合说明。

首先，我国古代，以所西向的山、川、台、丘命名城门，似乎是一种惯例。比如，鲁国城南偏西有舞雩台，其所向之城门，就被命名为雩门。齐之稷门的得名，当由于同临淄城外的稷山相对；而考古发掘表明，齐之稷山正位于临淄古城旧址正南略偏西，可

见稷门不应是齐之西门而是南门。

其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接待稷下“列大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也似指齐之南城门一带。《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一文，曾详细描述了“连接南墙而门和北墙东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干道，“全长近四千四百米，中间有两处拐弯，路宽二十米。”这条既宽且长的大道，可谓“康庄之衢”了；而在城南门左近，在这条主干道的侧旁，兴建“高门大屋”，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反观齐城西边城门一带，《勘探纪要》明确指出：“一般地层较浅”，由于地势低洼，除一些居住点以外，是大片空隙地，这里文化堆积最浅，似与《史记》记载不相符合。

再次，《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称：“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莒国位于齐国南方而偏东，莒子由莒来齐，就常理而言，亦当为入自南门；因而“盟于稷门”，也就是在临淄的南门为盟了。否则，设若莒子自南而来，却道开南门，绕道去西门同齐人相见，虽非绝无可能，但显然不如直接合

于南门为较近乎情理。

以上几点考索表明，稷门应为齐城之南门，有名的稷下学宫，不是建立于城西，西当是设置在古临淄城南门之下的。

肯定了稷下学宫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对于我们的研究有些什么实际意义呢？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稷下学宫同齐国政府所在地紧相毗连，这使我们猜测，初建时的学宫，很可能其本身就是田齐政府机构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一九六一年第六期）告诉我们，临淄古城之西南一隅，别有一个小方城，此即《临淄县志》之所谓“营丘城”。西当地人则明确呼之为“皇城”，皇城者，即田齐政府机构之所在处也。上文考索说明，稷下学宫的地址，恰恰就设在皇城东南边缘附近。当时在建筑上的这种安排和布局，如果不是基于执政者需要同稷下学宫经常有所联系，彼此传递情报和信息，如不是前者为了政治上需要及时地利用后者这一组织形式，又是为了什么呢！？

《战国策·齐策三》有“淳于髡一日而

见七人于宣王”的记载。一日之内居然能够七次出入于齐王周围，可见稷下先生们同齐王接触之频繁，往来之方便，这至少证明“稷下”同田齐政府间的密切关系，做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注脚。

二、稷下学士活动的主要内容

稷下学宫开始建于齐威王（公元前三五六年至前三二一年时）《史记》、《新序》等书称稷下先生邹忌、淳于髡等曾经见于威王，因作此推测。又按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引三国魏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然而，桓公（田午）立稷下学宫之说，不见于其它古籍。孟子游齐为宣王时事。与“桓公”云云亦难相合，疑是《中论》文字有误，宣王之时趋于极盛，齐湣王以后时兴时衰，以至战国结束。前后存在约历百年以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宣王时，稷下之士曾多达“数百千人”，其中被“赐列第为上大夫”者竟有七十六人。不难想见，当时学宫的规模多么庞大，其声势又是

何等显赫。

被“稷下”吸引来参加活动的人物，是战国时代十分活跃的“士者流”，即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里进行对许多问题的研讨、争辩（所谓不治而议论），可能还举行定期的集会（所谓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接待来此“游学”的人士（比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赵人荀况，就曾“游学于齐”，到过稷下），以及著书立说等等。这类活动，显然包含较多属于学术文化方面的内容。忽视这些方面的内容，把稷下学士看作同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一般无二，显然是不对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稷下”为何被后人称为“学宫”，以及稷下诸人为什么往往被称为“学士”，被尊为“先生”、“老师”了。

然而，有的同志据此面把稷下学宫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或者认为“似乎是一种研究院性质”，这就未免过于强调了一端，而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多少有些简单化了。事实上，聚集于稷下的尽管是一批知识分子，但其从事的活动，总的说来，却不能不有其一定的政

治目的，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新序·杂事》篇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政事”，当然就是超出于单纯学术的内容。这对“不治而议论”正是一个很好的注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稷下先生著书立说，同样是着眼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力图投合“世主”的胃口，凡此等等，用一般理解的所谓“最高学府”、“研究院”的活动内容去作解释，就不能不说有些牵强。

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稷下先生者，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有的还往往亲自过问国事，直接参预政治，他们既是“学士”，又是“政治中人”。这就更加突出了稷下学宫存在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意义。

桓宽《盐铁论·论儒》篇中说：齐湣王之时，由于国君“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诸儒，即指稷下诸学士，诸学士谏齐君不见其效，就离开学宫到异国去，足见他们向齐君出谋献策有责任

感，其与齐政府关系之密切是很清楚的。

《战国策·齐策三》、《说苑·尊贤》具体记述了著名的稷下先生淳于髡怎样劝阻和批评了齐王，他在“齐欲伐魏”的关键时刻，及时地向齐王分析了形势，说明出师的不利：“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从而阻止了齐王一次错误的行动，他当面批评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独不知“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淳于髡这里扮演的，简直是活跃于齐王身边的重要谋臣和谏官的角色。

《战国策·齐策四》记述了稷下学士田骈的一则故事：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过嫁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费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设为不宦”的田骈，却实际上据有丰厚的俸禄，广多的徒众。“不宦”却比“为宦”得到的实惠更多。这就使我们看

出，所谓“不治而议论”的“不治”，恐怕也是一个“虚假之辞”。就是说，稷下先生名义上是不做官的，然而他们（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同为官者的差别，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如何而已。

如果说田骈是稷下先生当中“不治而议论”的一个，那么比田骈稍早的邹忌，则是由“议论”而终至直接踏上了仕途。他“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得到“聪明捷敏”的美誉（见《新序·杂事》）。邹忌同齐国一般官吏的不同，只是进身之途有些区别罢了。

也有些稷下先生，还曾经奉齐王之命，肩负重任，出使于别国。刘向《别录》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现）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此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转引）。证明邹衍曾以“齐使”的身分到过赵国。又据史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经过薛地时，被‘孟尝君令人体（礼）貌而亲郊迎之’”（见《战国策·齐策三》）；并曾当“楚大发兵加齐”时，受齐

王命“之赵请救”（见《史记·滑稽列传》）。

书缺有间，稷下学士们同齐国政府的全部关系，今天已难于详考；但上述一些记载，还是足以使我们相信。为“稷下”所吸引、所招徕的学士，并不是醉心于“自由争鸣”，逃避现实斗争的隐者之流，而往往是些热衷仕途，凭借知识才能出没于政治风浪间勇于弄潮的人物。事实上，恰恰正是这样一批人，才完全符合了号称“喜文学游说之士”，“览（揽）天下诸侯宾客”的齐王的真正需求。

这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在战国中、后期那样一个诸侯割据，兼并激烈的时代，齐国（同其它诸侯国一样）所面临的急迫、严峻的任务，毫无疑问首先是怎样富国强兵，怎样做到“进”有可能成就王业，而“退”则足以能自保，在此大势之下，齐国居然饶有兴趣地在政府旁侧建立一个庞大的“学宫”，并且慷慨地给诸“学士”以上大夫直至卿、相的称号，给予“高门大屋”、“赏养千钟”的优厚待遇（《战国策·齐策四》齐人见田骈章的记载）。固然是为了博取

“礼贤下士”的名声，而同时，如果没有急切的、直接的政治需要，如果没有现实的、明显的政治好处，田齐的执政者怎么会多此一举呢？

三、稷下学宫的历史作用

稷下学宫的存在，对田齐政权一直从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史书记载，在齐威王和宣王时，由于执政者接受了稷下先生们的劝谏，一度获得了“齐国大治”，“诸侯震惊”，“燕、赵、韩、魏……皆朝于齐”的效果；一些稷下先生出使别国，也总是使得不利于齐国的形势有所改观。这些记载虽不无夸大成分，总的看来应当还是有其根据的。

秦、汉时代，朝廷有设置博士官的制度，所谓“博士”，也是一些服务于一定政治需要的知识分子。秦、汉设置此官，可以说是直接受到战国时代田齐设立稷下学宫的影响（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汉初博士叔孙通号“稷嗣君”，另一位汉博士孔安国，也被称为“棘下生”（“棘下”即“稷下”），都足以清楚地看

到这种影响。这反过来也正表明了当日的稷下学官，的确对田齐政权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然而，自汉以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当战国时代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逐渐成为远古的陈迹。当田齐政权本身在后人头脑中也成为一个渺茫的印象时，稷下学士们原先曾在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少地为人所注意；而“学士”们为“干世主”、“言治乱”写成的一些历史和哲学的著作，却以其深邃的思想，以其历史内容和文学趣味，在学术方面显示出特有的价值。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是由于产生了一批传世的学术著作，稷下学官才至今保留着响亮的名字。

《汉书·艺文志》记述了一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数。它们是《孙卿子》三十三篇、《蜎（环）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就思想倾向而言，《孙卿子》被班固归为儒宋；《蜎子》、《田子》、《捷子》被归为道家；《邹子》、

《邹子终始》、《邹奭子》被归为阴阳家；《慎子》被归为法家；《尹文子》被归为名家；《宋子》被归为小说家。显然，仅就班固所见，稷下先生所著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其思想内容是复杂而丰富的。不难想象，这么一大批著作的涌现，对于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个多么大的推动；它们本身为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多么宽阔的天地。

这里，我们还想提到两部在历史上广有影响的著作。就是《管子》和《晏子春秋》。这两部书在哲学、历史学以及文学上的地位，今天已经无须多说；然而他们的时代和作者，却依然众说纷纭。在我们看来，这两部书也是出于稷下学士之手。

《管子》托称管仲所作。管仲是春秋时齐国的名相，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事迹，在齐国无疑是多有记录或流传的；而齐人重视管仲的事迹，仰慕其为人，又是十分自然的事。郭老认为《管子》书中有“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郭沫若著《青铜时代·宋钎尹文遗著考》），这点应该完全有可能；冯友兰先生认为《管子》

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见冯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也有一定道理。综合诸说，可以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是：“稷下先生顺乎历史的要求和齐人的需要，整理了管仲的遗著（或有关管仲的言论、事迹）。同时，在整理过程中也掺进了他们的某些论著，总其尔仍称之曰《管子》。”

另一部托言晏婴所著的《晏子春秋》，主要记述春秋末年齐国又一“贤相”的事迹。晏婴虽无管仲那样的赫赫功勋，但“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其为人同样得到齐人的敬重；其事迹在齐国也有相当多的记载和传闻。柳宗元怀疑《晏子春秋》“非齐人不能具其事”（《见柳河东集·辩晏子春秋》）。孙星衍《晏子春秋序》称：“《晏子》文最古质，疑出于齐之《春秋》”。都是甚有见地之论。而能够披阅齐国的史书——《春秋》；又能站在齐国人的立场去敷衍晏婴的故事，成书的年代又约在战国中期以后（参看高亨先生《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晏子春秋》的写作，显然也是以归之于稷下先生最

近情理了。

由此可见，传世的稷下学宫的著作，并不限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稷下学宫在我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它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值得我们充分给予重视。

历史现象多么复杂：一个直接服务于田齐政治需要的稷下学宫，却产生出如此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复杂、丰富的学术著作；齐国执政者一手设置的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机构，最终竟在促进文化发展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那末，怎样解释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呢？

首先，稷下诸人既为“学士”，自不同于当时依附于诸侯的一般政客。他们知识丰、见闻广，急于发表见解，长于分析问题；他们除直接参政以外，也相互“议论，著书言事”，而他们的“议论”、“著书”，尽管总是针对而前的现实，但在表达上，却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比如邹衍，写了“《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专批评“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的现象，主张止归于“仁义节俭”。

他的著作却号称“其语宏大不经”，具有“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特点（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于是成了“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之作。又如荀况“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等等，而“序列著数万言”（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是，他讲“正名”，述“王制”，论“解蔽”，明“天伦”，倡“性恶”，以至激烈地“非十二子”，也就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发表见解，而带有一定的理论抽象和较多的学术成分了。

其次，当与战国时代“争鸣”的社会风气有关。战国三百多年，政治上既没有统一的局面和集权的中心；思想文化领域更不可能有公认的圭臬和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威。众多的政客和学士，都从自己的立场、倾向出发，积极地探求现实社会的出路，他们免不了由于立场不同、倾向有异而激烈交锋；有的即便立场、倾向比较接近，而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也会竞长较短，争论不已。这种社会风气，不可能不反映在知识分子如此集中的稷下学宫当

中。班固把一批稷下著作，分别划归儒、道、名、法、阴阳、小说，虽未必尽当，但稷下诸学士绝非同属一个流派，则可断言（有些同志在文章中，把稷下学士笼统称“稷下学派”，似有不妥）。不同学派或不同倾向，容易引起彼此之间的辩难，也会促成相互的切磋琢磨，这两种情况，归根到底，对稷下出现学术论著群花竞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都是一种有利的促进。

再次，田齐统治者肯于为“学士”们兴建学宫，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给予优厚的待遇。无庸讳言，都从客观上保证了稷下诸人学术活动的开展和正常写作的进行。另外，田齐执政者如威王、宣王，较能接受来自臣下的劝谏、批评，听得进某些不同意见，能容纳某些听来“迂大”、艰深的议论等等，也鼓励了稷下学士的相互争鸣和著书立说。还有，齐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上所说，更是为某些著作的产生，准备了可资凭借的资料，凡此等等，不多赘述。

总之，稷下学士的著作，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笔宝贵的遗产，对于它们，我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至今做得还不够。从哲

学、历史学和文学上对稷下著作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基础——它那内容的现实性、功利性。要知道，稷下学宫的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从这里入手进行研究，我们才不致于迷惑于某些复杂现象，才有可能给予这批重要学术著作以更准确的评价。

作者：董治安同志，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

王志民同志，淄博师专副教授。

齐学、鲁学与稷下学宫

蔡德贵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适应“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政治形势，诸子“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齐学与鲁学之间，包罗众多学派，互相争鸣，互相影响，互相交融，至齐国稷下学宫，一个新的文化系统，齐学化的鲁学便开始形成了。这是我国思想史上各种思想通过对立斗争面趋向融合统一的典型一例。

一、齐学和鲁学的渊源及差别

在学术思想和学风方面，齐学、鲁学之分，源于西周，起自春秋，烈于战国，沿及汉代。汉代，《诗》有今文鲁、齐、韩三家；《论语》有鲁论、齐论；《春秋》三传中谷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实际是齐学同鲁学之争。前汉重今文，

齐学；后汉重古文，鲁学。追溯二学渊源，可至齐、鲁建国。

周初，周公封于鲁，建立鲁国并创立鲁学，传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姜太公封于齐，建立齐国并创立齐学，传至管仲形成齐学系统。《管子》一书，虽非管仲所作，但却反映了管仲代表的齐学思想。

齐鲁之学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发展系统和思想模式，是由于齐、鲁两国在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和民俗上的差异造成的齐、鲁之学的不同内容和特点所致。

(一)从地理环境和民俗看，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

“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史记·齐世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西鲁国在泰山之阳，地处丘陵地带，从地域上说比较封闭，不象齐国那样依山傍海。《史记·货殖列传》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故其民齷齪。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嗇，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二)从经济条件看，齐国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耕、鱼盐、运输、农工商并重，多种经营。《汉书·地理志》说，齐国建国初期“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霸）功，身在倍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到战国时期，齐国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都城临淄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商业都会，如苏秦描绘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齐之强，天下莫能当。”（《史记·苏秦列传》），这是一个商业大国的局面。由齐国这种经济的多样性，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为思想的多样化准备了条件，遂成沿海文化的类型。而鲁国则只重视农

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采取一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史记·鲁世家》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鲁国提倡重视农业，而不重视商业，“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鲁语》上）。这里的“务力”和“动不违时”都是农业方面的事务。这种单一的农业经济就限制了思想的活跃，因此使鲁学的学术思想也是单一的，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容许其它思想的存在，造成封闭的大陆文化的类型，不象沿海文化那样开放和民主。

（三）从两国统治阶级的成份来看，齐国从建国初期就重视工商业，所以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是工商奴隶主，他们在思想方面有较多的民主性，这很类似于古希腊的工商奴隶主。后来，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化成的地主阶级，也就成为商业封建主，他们仍沿袭齐国老传统，坚持多种经济，允许学术思想自由发展。许多科学家如医学家扁鹊、天文学家甘德等，科学著作如《考工记》、《素问》等，出在齐国而不是其它国

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鲁国在奴隶社会时期，其统治阶级就是农业奴隶主，由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化成的地主阶级，成为农业封建主。农业封建主的眼光比较狭小，受封闭的农业经济的严重束缚，远不如商业封建主那样开放。

（四）从政治倾向看，齐国重视霸道和法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依靠的主要就是霸道和法术。所以管（仲）晏（婴）之法的很多内容也都是谈霸道和法术。当然齐国也重视礼治。只是以法治为主，把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了。而鲁国则重王道、礼义，本礼乐，行礼治，以尧、舜、周公为典型，保存宗法制度，所以鲁国的宗法关系非常牢固。

由于以上原因，便造成了齐学、鲁学不同的学术内容和特点。

从内容看，在单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鲁学，以儒家思想为宗，排他性特别强，比较守旧。而在多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齐学，其学术思想的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因此它能先后容纳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儒家、纵横家、农家、兵家，乃至方技、术

士、方士等等的思想，使齐学的思想相当丰富，使齐国的思想相当活跃。一所容纳数百千人的包罗各家在内的稷下学宫，出在齐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难怪有人说：“战国学术，多出于齐”。

从特点上看，齐学主变、主合时，有革新精神，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管子·正世》篇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表现出齐学崇尚变革的精神。鲁学主常，主合古，倾向于保守，凡事都力主维持现状。《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赞同的“仍旧贯”三个字是反对“改作”的。在鲁、齐夹谷之会上，孔子曾责备齐景公不恪守周礼。这些都表现出鲁学不肯变革的保守精神。

由于齐学与鲁学在内容、特点等方面的不同，在相互交流发展中就难免引起矛盾斗争。齐学与鲁学的公开对战不少，举其要者，有：

（一）鲁学的孔子和齐学的晏婴之间的矛盾斗争。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悦，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于鲁（《史记·孔子世家》）。

（二）鲁学的孟子对齐学的贬斥。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

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看不起齐学，他还说过“此非君子之言也，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上》）这是鲁学对齐学的挑战。

（三）鲁学的孟子与齐学的淳于髡的争论。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也，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

另外，《孟子·告子下》也有他们的争论，淳于髡主齐学，这里齐学对鲁学取进攻姿态。

就这样，齐、鲁之学斗争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到战国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却在齐国稷下学宫的论战中，二学开始了奇妙的融合。

二、齐、鲁之学在稷下学宫的融合

从上文看，齐、鲁之学斗争是长期而激烈的。孔子曾经抱着改造齐国学风的愿望到齐国去劝说齐景公，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但是，却因遭到晏婴的坚决抵制而告失败。之后，孟子出于同样目的到了齐国，力劝齐宣王行仁义之政，几乎成功。但由于当时齐国齐学仍然很盛，淳于髡、田骈等齐人在稷下学宫中的势力很大，孟子的愿望实现不了，故说：“久于齐，非吾志也。”（《孟子·公孙丑下》）但是，孟子在齐国时间很长，而且与稷下先生宋钘、淳于髡等进行过争论。在争论中，他不但没有说服对方，反而受到齐学的许多影响，使自己的思想出现一些与齐学相通的东西。如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这与《管子》的思想一致。《管子》说：“民富则易治也，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陵上犯禁，故难治。”（《治

国》)。孟子还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管子》中也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这是鲁学受齐学影响的明显例证。

在齐国有大影响的儒家人物是荀子，他虽不是鲁国人，但其思想本系鲁学系统的。荀子在稷下学宫中成为祭酒，多次执稷下学宫之牛耳。他曾拜齐学大师淳于髡为师，故其思想中逐渐吸收采纳了不少齐学中的东西，使鲁学齐学化了。如他讲儒家的仁义，也讲齐学中才有的利、法、刑，主张法后王，强调富国强兵。可以说，《荀子》一书是齐学鲁学融合的产物，这一融合是在稷下学宫中完成的。

除了《荀子》以外，在《管子》这部书中，齐学与鲁学也有有机地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稍微涉及一下《管子》一书的内容，就可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管子》讲仁，讲义。“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

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戒》），“孝悌者，仁之祖也。”

（同上），“君子之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立政》），“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五辅》），“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亲之以仁，养之以义。”（《幼官》）。

《管子》讲正名。如“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故先王贵名。”

（《枢言》），“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君臣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心术上》）。

《管子》讲礼义。如“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修靡》），“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事君有义，使下有礼。”（《四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

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心术》上）。

仁义、正名、礼义这些原本都是属于鲁学中的主要思想，而《管子》这部书则予以合理地吸收，使齐学鲁学化。

《管子》中更有大量齐学的东西：

《管子》讲法，如“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法禁》），“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

（《权修》），“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西明是非也，百姓所县（悬）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厄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禁藏》）。

《管子》讲阴阳五行。如“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者之大经也。”

（《四时》），“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日至，睹甲子木行御，……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五行》）。

《管子》讲鬼神。如“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牧民》），“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权修》）。

法、阴阳、五行、鬼神，这些都是齐学中的传统思想。稷下齐法家注重法，邹衍注重阴阳五行，齐国是太公封地，太公思想上承黄帝，后来的齐国君主也继统于“高祖黄帝”（《陈侯因咨敦》铭文），黄帝“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禪为多焉”（《史记·五帝本纪》），祀鬼神也就成为齐学中的一个传统。

就这样，《管子》和《荀子》把齐学和鲁学融合起来。《管子》是以齐学为本，鲁学为末；而《荀子》是以鲁学为本，齐学为末。但都熔齐学、鲁学于一炉。这是既不同于齐学，又不同于鲁学的一种新的思想模式。这种新的思想模式之所以会在稷下学官中形成，有所必然的原因：

（一）政治上统一趋势的要求。

孔子和孟子都曾经想改变齐国的学风，但在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篇》)的时代,学术思想只能适应“天下大乱,贤圣不明”(同上)的局面,所以他们的希望只能成为泡影。而到了战国中、后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书同文,车同轨”(《管子·君臣上》)的大局已定,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就成为思想家们注重的课题。齐国统治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在稷下设馆,招来众多知识分子,让他们在这里相互辩论,相互吸取,这样就为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和统一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二)齐国统治阶级是商业封建主,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齐威王、齐宣王都是开明之君,特别能够吸取不同意见。尤其齐威王,他能够广开言路,接受邹忌的规谏,提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市,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为满足称霸和统一中国的欲望,齐威王能够悉心求治,愿闻谏刺。君王能如此豁达大度,思想的活跃就可想而知了。齐襄王时,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让儒家人物荀子主持稷下学宫,更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

为各种思想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 齐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要少些，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不象鲁国那样封闭，处处拘守于周礼。

《淮南子·齐俗训》说：昔太公望、周公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鲁国尊尊亲亲是行礼治，用常道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宁。而齐国则举贤尚功，用人唯贤，不必问门第资格，后来的管仲又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主张，“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同上）。这种尚权变的精神一直是齐国的传统，因此象淳于髡那样社会地位很低的“赘婿”也可受到重用，可以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贡献给社会，为齐学、鲁学的交融贡献自己的力量。

荀子和稷下齐法家的思想都是齐学、鲁学互相交融的结果。但荀子和稷下齐法家都来顾及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论证，所以

他们的思想并未受到后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封建统治者重视的是邹衍的齐学化的鲁学。邹衍在齐学、鲁学交融的基础上，把齐学中所容纳的各种有益于统治的理论内容融进了鲁学即儒学的内容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思想模式，这就是邹衍的齐学化的鲁学。这种齐学化的鲁学将齐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吸收到鲁学中以后所形成的新的思想模式，很容易为封建专制君主的登上历史舞台作为论证。而且每一朝代的更替都可以从这种思想模式中找到根据，如秦、汉王朝的统治者都说自己是代表金木水火土五德中的某一德而登上统治宝座的，从而把自己的统治当成天经地义，当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从汉代以后，代代封建皇帝颁布的圣旨开头都要写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利用这种齐学化的鲁学的典型事例。齐化的鲁学把人君神圣化，加之齐学中的法家思想也可以利用，就很容易为整个封建王朝服务。事实上，汉代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儒术，也是齐学化的儒术，董仲舒的思想就是齐学化的鲁学。惟此，齐学化的鲁学才保持了

二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历久而不衰。从这一角度来看，齐学、鲁学的融合及稷下学宫的出现，确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思想家们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

作者：蔡德贵同志，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稷下学派简述

刘绍华

对稷下的记载，散见于史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还提到孟轲、荀卿、驺奭等。其中邹衍在诸侯各国受到很高的礼遇，荀卿则三为稷下祭酒，孟轲游齐，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想见当日盛况。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著书立说，互相争辩，互相学习，形成学派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数，它们是《孙卿子》三十三篇，《蜎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

《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班固把各家分作若干学派，荀卿、孟轲为儒家，环渊、田骈、捷子为道家，邹衍、邹奭为阴阳家，慎到为法家，尹文为名家，宋子为小说家等。本文想对稷下学者及某些有关人物的思想倾向，作一简述，以求得大家指正。

一、儒家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今山东省邹县，生活于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公元前二八九年，正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孟子从孔伋的学生那里，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后世称作“亚圣”。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以“圣人之徒”自任，起而捍卫“圣人之道”，到各国传播儒家王道、仁政理论。他先后到过齐、宋、滕、鲁、魏（梁）等国，以在齐国的时间为最长，约三十年；有弟子三〇〇余人。可是，“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

战胜弱敌；齐威王、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而朝齐。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他的主张，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无人接受。七十多岁时，便回到家乡，“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给后世留下了《孟子》一书。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的本性生来是善的，那些不善者，是客观上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不能尽其本性以及个人自暴自弃不肯学好的缘故。因此，他强调要用主观上的存心、养性、修身、寡欲，来抵制客观世界的影响。他又认为，这是只有君子能做到而小人是做不到的。这样，他从先验的性善论出发，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深渊。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坐稳江山，否则，便会被推翻。灾荒之年，野有饿殍，而国君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却不开仓赈济，这是杀人以政，是率兽食人。这样，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报复。象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杀死他是天经地义的，不能认为是“臣弑其君”。他

还劝各国君主处理好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政治上的核心思想是“行仁政”。他提出“行仁政”就要“制恒产”，恢复井田制，使黎民不饥不寒。这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能为诸侯接受。他提出“行仁政”就要薄赋敛，象古代“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不要“有布缕之征，粟米之争，力役之争”（《孟子·尽心下》），最好是“助而不税”。但当时战争频繁，用度浩大，哪个诸侯也不听他这一套。他还提出“行仁政”就要省刑罚，用“教民”代替刑罚，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孟子一生两度到齐国，第一次在威王时，第二次在宣王时。他第二次来，有“从者数百人”，受到齐宣王的尊敬，曾多次召见他，一起讨论政事。他在稷下三十年，曾与稷下其他学派进行过激烈辩论。

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姓荀名况，字卿，也称孙卿，约公元前三一

三年至公元前二三八年在世，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况年十五即游学稷下，齐襄王时，他三度担任稷下的祭酒，讲学授徒，曾到过楚、秦等国，晚年居于楚国兰陵，法家韩非与李斯，都曾师事荀子。荀况“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后人辑为《荀子》一书。

荀况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自诩是孔孟儒家学派的正统嫡传，但他的思想较孔子有很大发展，与孟子也有明显差异，在方法论上，兼有法、道、名、墨各家的因素。他批判孔子的“天命观”，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隆礼重法，礼法兼用，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他主张尚贤使能，“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荐举要“外不避仇，内不阿亲”；他主张平政爱民，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甚至说“天生之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根据当时的历史形势，反复宣传统一中国的主张，渴望实现“天下为一”。以上三点，即其治国的大政

方针。

在认识论上，他反对孔子的“生而知之”与孟子的“良知”、“良能”之类的先验论，主张“以心知道”，即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心的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他对当时诸学派在名实关系上的三种错误，深刻地进行了批判，指出墨家讲的“盗，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是“惑于用名以乱名”，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批评惠施提出的“山与泽平”的命题，是“惑于用实以乱名”，即用个别事实混淆概念的确定含义。对公孙龙名家学派“有牛马非马”的论题，指出这是利用“牛马”这个集合概念与马这一单独概念的区别，否认了牛马中包含了马，指出是“惑于用名以乱实，”即用名的差异而混淆实际事物。

荀况无愧为稷下的祭酒，他确实堪称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劝学篇》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说人们生来并没有多大差异，君子所以能超过常人，是因为善于学习，是“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是“善假于物”，他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人只要不怕笨，能勤奋学

习又坚持不懈，去“积土成山”，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必定会收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二、阴阳家

稷下的邹衍、邹奭都属阴阳学派，邹衍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国人，生活于公元前三〇五年至公元前二四〇年，稍后于孟子。邹衍的思想学说，在《史记》中有简单记述，“睹有国者益淫奢，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邹衍与先秦诸子一样，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认识之后，为解决时弊，才著书立说的，他的出发点是“深观阴阳消息”，即对早已产生的阴阳学说作了更深入的探索和更多的发探，在此基础上，“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从眼下的事物出发，推论到无穷。

阴阳学说，在齐国深受欢迎，邹衍去见梁惠王、平原君，都受到优礼接待，特别是

到燕国时，“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这比起以前孔孟周游列国所遭到的厄运，真如登上九天，汉初的司马谈，曾把阴阳与儒、墨、名、法、道德五家并列，而且放于首位，可见战国时代阴阳家的学说，曾风行一时。

三、纵横家

稷下的纵横家，有淳于髡、鲁仲连等人，他们聪敏善辩，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往来于东方各国之间，救危扶困，抗拒强秦。

淳于髡是“齐之赘婿”，聪明机智，滑稽善辩。经常出入王庭，受到国王器重。淳于髡或讽谏齐王，或出使邻国，或荐贤举士，或折冲尊俎。齐威王即位之初，“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则以隐语讽谏，使威王下决心一鸣惊人，烹杀阿大夫，赏赐即墨大夫，“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诸侯皆还齐侵地，二十年间不敢

向齐国挑蚌。可谓淳于髡一席谈话，挽救败亡的齐国，并使之强大。齐威王八年，楚国兴兵进攻齐国，淳于髡被派往赵国请救兵，按照威王的办法，是请不来的，淳于髡则机智地指出威王“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这样，“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使得“楚闻之，夜引兵而去”。随后，又劝谏威王“罢长夜之饮”。对相国邹忌，以五段微言敦促他实行政治改革，调解君臣关系，加强国内团结。淳于髡曾在一天之中，向齐宣王荐举七个贤士，对于齐国的强盛，淳于髡是有很大功劳的。对不切实际的儒家说教，淳于髡十分反感，曾与儒家代表孟轲进行过两次激烈辩论。一次是针对孟轲提出的“男女授受不亲”，淳于髡质问道，假如嫂嫂掉在水里，要不要用手拉她？孟说用权变作了支吾，紧接着，淳于髡又追问，如今天下人处于战乱饥荒中，如掉在水里，你为什么不去救援？孟就无言以对了。还有一次，针对孟轲宣扬的“仁”，指出孟轲里为齐国三卿之一，却没有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建树，是“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

之”，孟轲便只好以“君子所为，此人固不识也”来搪塞了。

鲁仲连，齐国人，“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能言善辩，长于外交。据说，鲁仲连十二岁时，见辩士田巴夸夸其谈，竟“一日而服千人”，便奋起说，如今诸侯加兵，齐国四面受敌，国家危在旦夕，你能拿出什么办法，若不能，请少说空话。田巴无言，只好“终身不谈”，秦王要称西帝，兵围赵国京城邯郸，胁迫赵王。魏国国王又派新垣衍到赵国，劝赵王奉秦为帝，正在危急时，鲁仲连到了赵国，亲见新垣衍，既表示了自己义不帝秦的决心，又斥责新垣衍是无耻的软骨头，使其“不敢复言帝秦”。秦将听说后，“为却军五十里”。赵国平原君为感谢鲁仲连，想给他巨大赏赐，鲁仲连不接受。他说，我与天下士所不同的，就是为人排难解纷而不要报答。田单攻打聊城数月不下，鲁仲连就亲写书信，射入城中，守城的燕将看了，发现自己不能得到燕王宽容，也不会得到齐国的饶恕，只得自刎身亡。田单大获全胜，回朝后请齐襄王授予鲁仲连官职，但鲁仲连却隐居赵来。《汉书·艺文志》列他为儒家。

四、法家

慎到是赵国人，生活于公元前三九五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是稷下法家学派的代表。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大约是在齐国的稷下进行的，曾著法书四十余篇。当时的法家如申不害、韩非等，都十分推崇慎到。

慎到本来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并对其精神实质作了阐发。他主张“去智去己”，“任法不任贤”，重法治不重人治，兼讲势治，认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难势》中曾引述过慎到的话，很可以看出他重势治的思想。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其失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者而能诎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而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慎到指出，龙

种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动荡不安的年代，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意愿。他不仅积极宣传这种主张，还不辞劳苦，带领学生到各国游说。晚年，还亲自往返于秦、楚两国之间，想说服两国罢兵。可是，在那种形势下，他这种思想脱离实际，各国诸侯一心称霸，谁也不听他的说教。

尹文是齐国人，曾以“见侮不辱”为中心，向齐宣王讲了一篇道理。他说：“你既然喜欢士，那末，具备孝、忠、信、悌四条的，你肯任他为臣吗？”齐宣王说：“这是难得的人哪！”尹文说：“如果他‘见侮而不斗’怎样？”齐宣王说：“见侮不斗，这是耻辱，我是不用他为臣的。”尹文说：

“虽然如此，他仍然是具备孝、忠、信、悌四条标准的士啊！”齐宣王语塞，紧接着，尹文又指出：“见侮不斗，是因你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命令。这即是说，你不准他斗，又反说见侮不斗是耻辱，这不是你硬加给的罪名吗？”齐宣王又无话可说了。

田骈，也有人称作陈骈，齐国人，可能是田齐的疏族，生当威、宣之世，年纪比慎到

大一些，是稷下被列为上大夫的七十六人之一。他主张“贵齐”，“齐万物以为首”，认为“万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要想找出确定的是非是不可能的，只要遵循无所不包的道去行动，就无智愚差别了。不因死而悲，不因生而喜，这就是“齐生死”。循道而行，古和今也一样，即是“等古今”，也就不必厚尧舜薄今王了。这无疑是对厚古非今，一切法先王的保守派的批判，是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舆论支持。

彭蒙，齐国人，是田骈的老师，他认为“古之道人”主要是能够做到“莫之是，莫之非”罢了。

环渊是楚国人，史书所称范蠡、范环、蠡环、蠡渊、便蠡、玄渊等，都是指他。司马迁说他“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应该说，他属黄老学派的一个分支，而充满法家味道。在学术思想上，对老子的学说有所修正和发展。老子主张绝对无为，环渊主张有为；老子主张“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环渊是分析其利害得失，然后趋利避害，计得防失。从《史记·甘茂传》中环渊对楚王问来看，他不

仅“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充当楚王的高级顾问，而且很有一套策略。

六、名家

战国时稷下并无名家这一称谓，只是把专门从事争辩名实者称为辩者或察士，到汉代才出现名家这一称呼。我们从久居稷下的儒家孟轲说的“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田巴在稷下“一日而服千人”等说法，可知当时名辩的激烈、普遍与持久。这对名家的形成、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名家的代表人物，班固在《汉书·诸子略》中，只列了邓析、尹文、公孙龙、成公生、惠施、黄公与毛公七人，其中，成、黄、毛三人事迹不可考，尹文是本于道家而兼名家，邓、惠、公孙三人，则是大家公认的名家。但是，名家学派还应包括儿说、田巴在内。应该说，邓析、儿说、田巴三人，在名家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公孙龙，他是名家理论的集大成者。

邓析是春秋末期郑国人，《汉书·艺文志》列其为名家第一，《吕氏春秋》说邓析

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刘歆在《七略》中说他是“操两可说，设无穷之辞”，有着明显的诡辩意味。

邓析的理论，被儿说、田巴继承下来，并从消极方面加以发展，使之成了脱离实际，肆情于概念游戏的诡辩学说，成了唯心论的诡辩工具。儿说首先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辩论命题，“借之虚辞”而“服稷下之辩者”。田巴是一个“离坚白”、“合同异”的辩者，曾在稷下“一日而服千人”。

儿说、田巴虽对邓析的诡辩理论有发展，但还是不完备的，到了惠施、公孙龙手中，才成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惠施、公孙龙在脱离现实、空言巧辩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们避开现实，专以概念上的“坚白合同异”之辩对抽象的“道”进行逻辑论证。公孙龙的著名论题是“白马非马”、“离坚白”，他说，“白”是说实体的颜色，“马”是说实体的形，色与形各不相干，故“白马非马”。他看到了马与白马两个概念的差异，即一般与个别的差异，但没有看到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在“离坚白”这一命

题中，他认为白石的“坚”、“白”两种属性，各自独立存在，他夸大了事物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事物的同一性。公孙龙的诡辩，被荀卿指为“惑于用名以乱实”。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与良好的研究学术的环境，形成了稷下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学者既标新立异，又互相学习，融合，很难说某人绝对是某家，稷下的学士们虽说是各立门户，但从今日看来，也是属于哲学的多，基于此，故军事家等，这里没有列出。

作者：刘绍华同志，临淄区志办公室副主编。

稷下学宫遗址考略

李剑 张龙海

“稷下”一名，始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稷士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复盛”两字的“复”字，说明前已有之，非自宣王始也。《史记·集解》引《新序》曰：“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邹忌相齐，为宣王之父威王初期。又据徐干《中论·亡国篇》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桓公乃田齐午，系宣王祖父，他自公元前三七四年执政，为田齐第二代君主。

“学官”，若以此始，当属战国初期事，所以“稷下”之设可谓久矣。另据《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此谓稷下之由来。

“稷下”与稷门关系甚切，因此，凡探

究“稷下”之历代学者，均对稷门座标进行一番深刻地研究。其成果，大体分为两种不同的见解。

齐城南门说：《史记·索隐》引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稷山处临淄南十多里；《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二〇年）“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因莒位于临淄东南，如齐莅盟的稷门，定为南门，似也顺理成章；《临淄县志·古迹志》（民国九年本）载：“古齐城十三门，西南稷门”；《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①认为古代城门以面向的山、川、台、丘命名的，似乎是一种惯例；《辞海》（修订本一九八〇年版）稷门条同其说。以上诸家，均认为齐城南门或西边南门因对稷山而名曰：稷门。

齐城西门说：《史记·索隐》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趾（址）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下”，古侧稷音相近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条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②

近代学者，对于“稷下”地望，概括起

来，不外乎上述两种观点。《辞海》（修订本一九八〇年版）关于“稷下”条目，持慎重态度，来敢盲从，它既没有因循旧说，也没有提出新的明确的方位。只是从广义上说：

“稷下，即齐国都城临淄稷下（西边南首门附近地区）”。

齐国故城——临淄，是有官、郭二城两部分组成的，两城墙垣衔接，构成了一个整体。据史书记载，两城共有十三门。大城（郭城）八门；小城（官城）五门。其名称，申、雍、杨、鹿、广、章华、东闾等，除东闾门在《左传》中明确载为东门（东门只有一鹿，自无争议）外，其他申、雍两门明文为西门，但西门有数处，也无法肯定。《临淄故城勘探纪要》中，已探得城门十二座，即北门三座；东门一座；南门（大、小城各二）共四座；西门（大小城）二座；小城北门一座，东门一座，皆与大城相通。临淄故城，处于淄河冲积扇面之前缘，地势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微微倾斜，其西部和西北部地势低洼，地下潜水，涌出地表，形成群泉，这样以来，故城东濒淄河；西依系水；北边是沼泽地带，只有南边地势高亢，因此，故城南门与两

门应是对外交通的主要方面。可以设想，当时齐国许多设施也多处故城的南面和北面，“稷下”之地望，自然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探讨了。

“齐有稷山，立馆其下”的观点，是晋代虞喜首先提出的。稷山处齐国故城南十多里，虽与故城南北遥相对映，但路途崎岖，又有淄河阻隔，这段路程，今天仍然不是交通便利的平坦大通，试想，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多为徒步而行，即便上层王公贵族士大夫阶级能够乘车骑马，往返一次，也是很费时间的。《战国策·齐策》有“淳于髡一日见七人于宣王”的记载，若淳于髡居稷山之下，一日七见宣王是不可能的。

稷下学宫，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稷下先生们的所谓“不治而议论”的争鸣宗旨，则是齐王广开言路，选贤任能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并以此争取社会贤达参与政治实现齐国大治的目的。稷下先生们常为齐王出谋献策，有的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等活动。如淳于髡以隐言说齐王，“为齐使于荆”，“楚大发兵

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求援”等，他几乎就是齐王的近臣，自然不会寓居于离齐都十多里的稷山之下了。因此，“齐有稷山，立馆其下”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稷下”原于稷门，持此见者甚多，并认为稷门为齐城西边南首门。

《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六〇九年）载：“夏，五月公（齐懿公）游于申池”，晋杜预注：“齐南城（按即宫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疑此则是”。语气虽不肯定，未便据为典要，但“申池在小城西垣之外，与古系水相接，此处有泉，即系水源头所在”（《勘探纪要》）。

《左传·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五五五年）记载：“赵武、韩起（按：起国将领）……，率诸使之师，焚申池之竹水（杜预注：申池，齐南城西门，文公十八年，杀（齐）懿公，纳诸竹中，其地多竹木。）”。所谓齐南城，即宫城，处齐郭城之西南隅，由此推知，齐城西门南首门当是申门。

《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十二月戊戌，赵武、韩起及秦周伐雍门之萩（杜注：雍门，齐城门），范鞅门于雍门，……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又《左传·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田）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左于道，及郟，众知而东之，出雍门”。如《韩非子·难三》“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战国策》中雍门凡三见；《汉书·艺文志》、刘向《说苑》、《内节》、《奉使》等篇均曾提及雍门，《战国策·齐策》、《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都说：“雍门齐西门也”。就以上所载，齐官城西边南之首门，不是稷门而是雍门。

《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五三二年）记载：“陈（田）桓子，五月庚辰，战于稷”（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大国时，齐有稷下馆）。

《水经注·淄水注》记载：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曰张逸问贇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

也。余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盟于稷门之外，汉以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史记正义》曰：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然棘下又是齐城内地名。

《史记·田单列传》附注《正义》引《括地志》云：“戟里城在临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时棘邑，又云画邑”。稷、棘、戟三字同音，齐国当时以“稷（棘）”为名的就有三处之多，即稷山；上述①、②两项可能是一处；另加棘邑。若以地名定城门，稷、棘、戟地所处，就不止是南门的问题了。

《左传》云：“鲁昭公十年，齐惠栾高氏皆嗜（嗜）酒（杜注：栾高二族，皆出惠公），僖内多怨（杜注：听妇人之言，故多怨），强于陈（田）鲍而恶之（恶陈鲍二族）。夏，有告陈桓子（无字）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杜注：文子鲍国），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指子旗、子良），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杜注：彼传信者。补正彼谓栾、高，言虽不实有此事，闻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

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指齐庄公），陈鲍焉往。遂伐虎门（杜注：欲入公不听，故伐公门。林（宋，林尧叟）附注：寝门画虎故名），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杜注：端委朝服），……。五月庚辰，战于稷（杜注：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栾、高败，又败诸庄（杜注：庄，六轨之道），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杜注：鹿门齐城门），栾施、高强来奔（去鲁国）。这段史料，虽是春秋时期齐国内部陈、鲍与栾、高两派贵族间的阅墙斗争，但在战斗过程中，涉及到的“虎门”、“晏平仲”、“稷”、“庄”和“鹿门”等人地关系，当可就此见其一斑了。虎门在林注中谓寝门画虎故名，这是表示国王的威仪，可以推定是宫城的北门，面对大城市区。据《水经注·淄水注》：“北门东北二百步，（注：周代以八尺为一步）有齐相晏婴（即晏平仲）冢宅，《左传》晏婴之宅近市，景公与易之，两婴弗更，为诫曰：‘吾生则近市，死岂易志’，乃葬故宅，后人名之曰清节里”。这里所谓北门，就是宫城北门，晏

嬰住处距宫城北门二百步，与《勘探纪要》所探测情况颇相符合。这是陈、鲍与栾、高两派斗争的序幕。五月庚辰，战于稷，就杜预注解，稷，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这一注解就很清楚了。传说稷，即后稷，为周族的祖先，教民稼穡，被尊为农神，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庙宇往往就是群众聚会的场所，也是滋事斗殴发生最多的地方，陈、鲍与栾、高两派首次在这里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栾、高败，又败诸庄”，这个“庄”，应该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的“庄”。《史记·集解》引《尔雅》曰：“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杜注：“庄六轨之道”，即路面的宽度，可以六辆车并排行驶，过去每轨宽度合今一点六四公尺，这样的道路宽度就接近十公尺了。据《勘探纪要》资料，在故城内探得有十条主要道路，其中最宽者达二十公尺；最窄者也在六公尺以上。证明勘探资料与历史情况相符，这是他们战斗的第二个回合：“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杜注：

鹿门，齐城门，未注明何处城门。“栾施、高强来奔”，至此他们的战斗才算偃旗息鼓了。这里涉及的“稷”和“庄”，是我们研究、探论的重点。就此得知“稷门”之命名，是于由稷地，而不是稷山；同时，也可以看出稷与庄两地相距非远，但也不是近在咫尺。若就《勘探纪要》发表的勘探结果与历史记述核对加以综合研究，会给我们以省悟，使我们对“稷下”地望有了新的认识。

《水经注·淄水注》：“系水傍城北流，径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从文物普查的情况看，从大城西部的邵家圈起，沿系水逆流南上，战国时代的遗址，星罗棋布，一直延伸到小城的西南部，看来这“湓池衿带”风景优美的地区，似是当年齐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莒子如齐莅盟”取道西门（稷门），照样是隆情厚仪，情遗理顺，合于逻辑的。据《水经注·淄水注》“系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而而流径梧宫南，昔楚使聘齐（即公元前三〇一年屈原使齐）齐王飧之梧宫，即是宫矣”。这虽是后话，但以一代文学巨擘来齐

居于此处，也可为之佐证了。在邵家圈村西距古齐城约百公尺处，有一古庙（庙祀何神，亦无所考），庙旁立有石碑一幢，上刻“稷下”二字。据乡里目击者反映；字体楷书，为双钩勒石，其风格与晏平仲墓碑相似，疑是明代遗物，很可能如“孔子闻韶处”之例，当时在此有所发现，立石以志。建国后群众曾以碑石搭桥，后不知下落，与此同时，附近曾出土大量陶片并有“树木卷云纹”瓦当，陶文中有“左邵鄙”、“邵鄙”字样，经考证系战国文物。该村系水环绕，颇符合“水次有故封处”的条件。再就“开第康庄之衢”，“期会于稷下”来说，据勘探资料大城内有七条干道，纵横交错，路面宽阔。大城东部南北大道长三千三百余公尺；城中南北大道长约四千四百余公尺。中间两处拐弯，路宽二十公尺；大城北部东西干道长三千六百余公尺；大城中部干道长二千五百余公尺，路宽十七公尺；大城西门向东有大道长约一千公尺，路宽十至二十公尺，这就是当时商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市井所在，这可能也就是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的宅第之处。这样他们既可以就近主持学宫事务，定期召集会议，安排学

术活动；又可以随时出入于齐王左右。由于当时建筑技术、材料和一般生活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稷下学宫只能是一个聚会的地点，办事的机构，而稷下的先生、学士们，则在“系水左右”，分散居住，安置在这连亘十数里的广袤地区，他们平日著书立说，分组（学派）学习、研究、讨论，定期参与集会，举行大讨论，互相辩诘，“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其言里殊，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临淄稷下学宫所从地望问题，是稷下学研究、讨论中一个被人十分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从事史学、文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并付出过很大的心血。但是，自汉代以后，凡涉及此者，多遵循稷下原于稷门，稷门原于稷山，稷山处齐城南，因此，稷门便是宫城南门旧说，虽据文献，言之有据，却不曾提出实际性的考查资料来，因而，聚讼千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得出一个符合史实的结论来。

我们感到，对稷下地望问题，重视文献

是非常必要的，舍此无据，但是文献所载多欠具体，仅据此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考查，方可提出有关稷下地望的新资料。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近年来，我们对齐故城及其附近地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普查工作，普查发现，齐故城郭城西北角外，是战国时期制陶窑厂，曾在这一带发现了“邵鄆”等陶文，窑厂遗址南伸，今邵家圈村西南隅，便是一战国时代的建筑遗址，这里瓦砾遍野，规模很大，其发展趋势，似沿系水（俗称泥河）左（次）岸南伸至宫城西门外。根据文献所载，结合普查工作，我们认为，宫城之南门之西边首门当是“雍门”，西门为“申门”，大城应有“两门”自南向北，首门为“杨门”，次为“稷门”，因此，这里也正是稷下地望之所在。

作者：李剑同志，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
张龙海同志，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馆长

八二年稷下学讨论会综述

郑杰文

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主办的稷下学讨论会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至十月十一日在山东农机学院举行。大会收到论文二十二篇，并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稷下学宫的地点及其性质，稷下学宫的历史及其作用，稷下人物及其著作，稷下诸学派的思想观点等。

稷下学宫所在地及稷下学宫的性质

“稷下”之名，始见于《史记》。《史记集解》、《史记索引》皆认为稷下学宫在齐城稷门下，然其具体位置却历来有争论：刘向《别录》认为齐城西门为稷门，学宫在西门下（《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虞喜则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史记索引·田敬仲完世家》引），故应在南门下。会上，李剑等同志同意前说。李剑同志发言说：齐故城西门有大路直通棘

邑，古人有以城门所对山水城邑之名命名城门的习惯，棘稷古通，故齐故城大城西门应是稷门，一九四三年曾在此处掘得一明代石碑，上刻“稷下”二字，此处并出土不少战国瓦当、画砖。董治安、王志民等同志则引伸了后说，他们认为：齐故城南门面对稷山，南门附近探得大片古建筑遗址，《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莒子如齐盟于稷门，莒在临淄东南，进南门较进西门为便，故学宫应在齐故城南门下。有的同志还论及学宫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处的问题。

稷下学宫的位置与其性质不无关系。董治安、王志民同志认为：稷下学宫靠近齐故城之宫城，很可能“是田齐政府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稷下先生过问国事，参与政治，奉命出使，所以稷下学宫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蔡德贵同志还认为：司马迁所说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不符合历史真实，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参与了当时的政治，“其中不少人还当过行政官吏”。孙以楷同志则认为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最早的科学院”，是“供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聂廷生等同志则调

合上两说，认为学宫“兼有参议政治和学术研究两种性质”。还有的同志提出它是齐宣王为表现“好士”而设立的接待学士的“招待所”。刘示范同志指出：学宫的性质不应光从“机构上讲，还应从学术思想上探讨”，“是先道家，再儒家，后纵横家”。

另外，孙以楷同志提到了学宫的人事管理制度，周立升、王德敏同志论述了学宫的学风问题。

稷下学宫史及其分期

关于稷下学宫的设立，胡家聪、周立升等同志依徐干《中论·亡国》所说，认为学宫设立于桓公田午时期，它是顺应战国时代变法改革的历史潮流，在地主阶级虽已取得政权，但思想上的统一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设立的。李剑同志补充指出：它产生在齐国，与齐国的经济繁荣和齐统治者“喜士”、“优士”以及东夷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学宫从兴办到终结约一百五十年。胡家聪同志从其政治作用上分为三个时期：桓公、威王时为前期，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

帮助威王变法革新，并出谋献策，使齐国在桂陵、马陵两战中，皆击败当时的强国魏国；宣王时是它的中期，学宫规模扩大，达上千人，稷下学大盛，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著作多出现在此时；襄王、王建时为后期，学宫仍按原来的制度开办，但因齐国国势渐弱，稷下学宫也走下坡路，荀况被迫离齐去楚。秦灭齐，学宫结束。蔡德贵同志则从学术思想发展上把稷下学宫分为两个阶段：从桓公田午初兴到威、宣二世为第一阶段，以孟子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各派的争辩为主，争辩中有部分融合；湣王、襄王、王建为第二阶段，以荀子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各派的融合为主，融合中也有争辩。

董治安、王志民同志强调了稷下学宫的政治作用：稷下先生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著书立说，有的并充当了谏官、使者。有的同志指出：稷下学派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来指导齐国的政治，在秦国法家思想已取得统治地位，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作用的情况下，仍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这对于齐国的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多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刚刚开始，其功过

是非的评价有待于更加深入地研究。

稷下人物及其著述

据司马迁所说，宣王时稷下学宫曾有“数百千人”，佼佼者七十六人。其中可考的人物及著作，孙以楷认为：儒家有孟子、颜福、王斗、田过、列精子高、匡倩、能意、间丘先生（疑《间丘子》为其所著）、孔穿（曾著《谏言》一卷）、徐劫（曾著《徐子》四十二篇）、鲁仲连（曾著《鲁仲连子》十四篇）、公孙固、荀子；道家有环渊（即蛭渊、曾著《蛭子》十三篇）、接子（即捷子）、季真、黔娄子（曾著《黔娄子》四篇）、告子（即告不害）；黄老学派有慎到（曾著《慎子》四十二篇）、田骈（曾著《田子》二十五篇）、彭蒙、尹文（著有《尹文子》一篇），宋钲、唐易于、袁淑（曾著《郑长者》一篇），另外，《管子》和《黄帝四经》都是此派的集体创作；阴阳家有邹衍（曾著《邹子》四十九篇）、邹奭（曾著《邹奭子》十二篇）；名家有田巴、儿说；纵横家有淳于髡；兵家之具体人物不可考，《司马法》、《孙臆兵法》、

《子晚子》为其派人物整理而成。以上诸派中，主要派别是儒家，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其次是黄老学派，以宋钘、尹文为主，是在稷下学宫这块特殊土地上孕育出的新学派。复次是阴阳家，以邹衍为主。

除此以外，蔡德贵同志指出，属于稷下先生们的著述还有《周官》（从顾颉刚说）、《法经》、《十六经》、《称》、《道原》（此四种从裘锡圭说）、《考工记》（从胡家聪说）、《太公书》、《春秋公羊传》（此二种从武内义雄说，并指出武内义雄考证《司马法》亦为稷下先生整理）、《易传》（从郭沫若说），宋钘有《宋子》十八篇、邹衍另有《邹子始终》五十六篇。

另外，孙开太、蔡德贵同志的文章还考证了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

稷下诸派的思想观点

与会同志的论文就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宋尹学派、名辩思潮、《管子》中的精气论以及淳于髡、宋钘、慎到、环渊等人的思想和行事作了讨论。

胡家聪同志认为：老子道家学说原在民

间流传，战国中期分化为两大支派，即仍在民间活动的庄子学派和上升为官学的稷下黄老学派。并依郭沫若同志《十批判书》之说，把稷下黄老学派分为三派：宋钐、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老聃派。这三派的学术主张除保存在《尹文子》及《慎子》残篇中之外，主要保存在《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宙合》、《枢言》、《白心》、《正》、《内业》诸篇中，其学术观点的特点是表现了与其他学派的融合。这些道家学者们在与学宫中的法家、儒家、阴阳家诸先生们的争辩中，形成了“因道全法”的黄老学说，即以法家法治为主导，以道宋哲学为从属，使道家哲学为法家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封建君主统治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新学说。

谢祥皓同志则认为宋尹学派不属于道家。他用《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此派的材料与老庄思想比照，认为宋尹学派不同于老庄学派而与“墨家思想十分一致，特别是他们为其政治主张而到处奔波、积极奋斗的精神”更为相似。他以《管子》中的《心术》、《白心》

《内业》等篇为基本材料，分析了宋尹学派与老庄道家学派宇宙观的不同：老庄学派认为“道”高于一切，先于天地万物，宋尹学派则认为“道”存在于天地之内，从属于天地；老庄学派认为“道生万物”，宋尹学派则认为“道”和“万物”并没有本末生化关系，而是表现为万物生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老庄学派认为“道”是虚无不可知的，有明显的精神性质，宋尹学派则常把“道”和物质性概念的“气”联系在一起；宋尹学派以为“心”十分重要，它与“道”相通，老庄哲学中则很少提到“心”。由此可见，此派主张与老庄道家哲学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

刘捷宸同志撰文研讨了稷下诸派与名家的思想联系，论证了稷下名辩思潮对名家学派形成的促进作用。周立升、王德敏同志的文章探讨了《管子》中的精气论，指出：精气论“上承老子，下启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发展的关键环节”。它首先肯定了“天”的物质性，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其中最精微者称为“精”；“气”的根本属性是它的流动变化性；“精气”由

于自身的运动变化生成了万物：“气”的最大特点是无定形而又无处不在。精气论认为，精神现象亦是由精气产生的，人的思想智慧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形体。

王德敏、周立升同志的文章考查了淳于髡的行事及思想，认为其主张具有无神论倾向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唯物主义倾向，是一个具有某些儒家特点的法家人物。王钧林同志对家铨的行事和思想作了考查，认为宋铨的思想兼有道家、墨家、名家倾向。刘蔚华、苗润田同志对《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慎到的记述作了考查，分析了慎到的思想。刘忠进同志撰文考查了慎到的思想演变及对韩非思想的影响。周立升、王德敏认为：环渊与关尹不是一个人，环渊曾对其师老聃所作的《老子》作过润色、增删。

讨论中，葛荣晋等同志还对以后的稷下学研究方向作了探讨，重点强调了资料工作。指出：要广泛收集资料，要发掘新资料，并要作好考辨工作。

附： 山东中国哲学史研究会
“稷下学”讨论会代表名单
(抄录原件)

王 轩	邹县文管会
苗润田	曲阜师院政治系
魏训古	淄博师专
侯元成	山东建材学院
曹维源	省社科院
刘大钧	山东大学
蔡德贵	山东大学
兑明德	山东大学
盛 利	济南市燃料公司
张季平	山东大学
王兴业	山东大学
刘捷宸	淄博六中
孙以楷	安徽大学
张龙海	临淄区文化局
曾淑照	淄博十一中
顾育龄	淄博师专
袁兆桐	淄博市教研室
徐植农	淄博市教育学会

王毓增	淄博师专哲学组
潘秀天	淄博市广播局
杨占娥	淄博市文化局
侯传生	淄博六中
刘示范	山东师大
于首奎	山东社会科学院
高晨扬	沈阳警察学院
张福信	淄博市市志办公室
张庆军	淄博市粮食局职工学校
刘蔚华	曲阜师院《齐鲁学刊》编辑部
王钧林	曲阜师院《齐鲁学刊》编辑部
谢祥皓	山东社科院哲学所
张智彦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编辑部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胡家聪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
孙开太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王华彬	临淄区委党校
李 剑	临淄区文管所
葛懋春	山东大学历史系
谭风雷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丁冠之	山东大学
李兴芝	山东大学

郭志坤	上海《文汇报》
周立升	山东大学哲学系
赵宗正	山东省社科院哲学所
王志民	淄博师专中文系
徐志邦	淄博师专中文系
张宏伟	淄博十七中
孙强	淄博商校
李捷之	北镇师专中文系
郑杰文	北镇师专中文系
刘忠进	淄博市博物馆
王德敏	山东农机学院
汪健	山东林业学校
张鸿科	《东岳论丛》编辑部
张义德	《光明日报》

(一九八二年十月)

作者：郑杰文同志，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
研究生

《稷下赋》释析

宋 玉 顺

稷下赋①

司马光②

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③；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于是筑钜馆，临康衢④，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美矣哉！高门横闲，夏（厦）屋长檐⑤；樽罍明洁⑥，几杖清严。尔乃杂佩华缨，净冠素履⑦；端居危坐，规行矩止。相与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⑧。树同拔异，辨是分非，荣誉樵株，谓之蓊蔚⑨，訾毁理美，化为瑕玼⑩。譬若兰芷蒿莎，布濩于云梦之沕；鸿鹄鸞鹤，鼓舞于渤澥之涯⑪。于是齐王沛然来游，欣然自喜，谓稷下之富，尽四海之美，概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⑫，进而称曰：“吾王⑬辟仁义之途，殖诗书之林，安民之虑广，致治之意深。然而诸侯未服，四邻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术之浅薄，未足以称王

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责寡人深矣，愿卒闻之。”对曰：“臣闻之，珉珠乱玉^⑭，鱼目间珠，泥沙攘者其泉涸，莠莠茂者其谷芜^⑮，网者弃纲而失绪，行者多歧而丧途。今是非一概，邪正同区，异端角进，大道羈孤^⑯。何以齐踪于夏商，继轨于唐虞^⑰？诚能拨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礼，践大圣之规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⑱。中正修列，谗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肤；使臣饭粱啮肥而餐，骄君之禄，不若荷锄秉耒，而为尧舜之徒。惜夫美食华衣，高堂间室，凤藻鸕仪，豹文麋质^⑲，诵无用之言，费难得之日，民未治不与其忧，国将危不知其失。臣窃以大王为徒慕养贤之名，而未睹用贤之实也已^⑳。”

注释

①《稷下赋》出自《山东通志》。所谓“稷”，指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战国时期齐国在稷门下所设的学宫称“稷下之学”。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创办于齐桓公（田午）之时，齐威王时有所发展壮大，宣王时

最为兴盛，湣王后期，一度衰落，襄王时再度中兴。当时儒家、阴阳家、道家和其他各派学者多集合于此。齐王对他们礼遇甚厚，赐封他们为“上大夫”。学官的建立，使齐国成了列国的学术中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文化教育史上所罕见的。

稷下的地理位置史家有异。临淄县志称：稷门为齐城西南门。《刘向别录》云：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现在学术界又有新的说法。

②司马光（一〇一九年—一〇八六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宝元进士。仁宗时，初任地方官，后为京官。王安石行新法，他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竭力反对。他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等二百余种，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面完备，确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鉴戒。诗文有《司马文公

集》。

③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齐王以慕求五帝的风华为乐，盛赞三王的宏伟功业。五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有三种说法，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和周代的文王、武王。烈，功业。

④于是筑钜馆，临康衢：于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旁，筑起宏伟的宾馆。钜同巨；衢：四通八达的大路。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⑤高门闳闳，夏屋长檐：高大宽阔的庭门，高高的房屋飞檐走厦。闳(kāng)，门高大貌。左思《魏都赋》“古公草创而高门有闳，宣王中兴而筑室百堵。”夏同厦。

⑥樽彝明洁：酒杯及酒壶明亮清洁。彝(lái)古代盛酒器，形似壶。

⑦尔乃杂佩华缨，净冠素履：(稷下先生们)便戴上佩有彩带的帽子，脚穿丝织的

鞋子。纓：系在颌下的冠带。《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绝”。

履：鞋子。

⑧上述羲炎：远则论及上古的羲皇和炎帝。羲，即羲皇（伏羲氏），神话传说中人物。相传从这时起，始结绳为网，进入渔猎经济生活。又传他和女娲氏兄妹族外相婚，始创嫁娶，正姓氏，由血缘家族向氏族过渡。炎，即炎帝，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原定居西北高原，后与黄帝合作，战胜共同敌人蚩尤结成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一说炎帝即神农氏。

⑨荣誉樵株，谓之蓊蔚：有时无用之材受到赞美，而称之为茂盛之木。樵株：代指平庸无能之人。樵：木荣，不能作工之料；株：本意是露出地面的树根，实指废根。蓊蔚：草木茂盛之状。

⑩譬毁理美，化为瑕玼：美玉受到毁谤非议而成为瑕玼。譬毁：毁谤非议。理，美玉，大六寸，其耀自照，这里代指贤者。瑕玼：玉上的赤色斑点，玼同疵。韩愈《进学解》：“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

⑪譬若兰芷蒿莎，布濩于云梦之沕；鸿

鹄鸛鶴，鼓舞于渤海之涯；这正如兰、芷与蒿、莎都杂生在云梦泽的低湿之地，鸿、鹤与鹭、鸕都在渤海之滨振翅飞舞一样（天下之士都云集于齐国的稷下）。兰，兰草。芷，白芷，多年生草本植物，兰芷代指高贵者、贤者。蒿，蒿子，指某些开小花并有特殊气味的草本植物。莎（Suō），莎草，也叫香附。蒿莎代指低劣者、庸者。洳，沮洳，低湿之地。云梦，即云梦泽。鸿，大雁。鹄，天鹅，鸿鹄代指高贵者、贤者。鹤，鹤鹑（黑枕黄鹑的别称）。鹭，水鸟名，似鹤而大，青苍声，后两种水鸟代指低劣者、庸者。渤海，古代称东海的一部分，即渤海。

⑫祭酒荀卿：荀卿即荀况（又称孙卿），世称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年—公元前二七八年）赵国人，战国后期思想家。他曾三度游齐，齐襄王时，他成为齐国稷下最年长的老师。《史记》说他“三为祭酒”。晚年废居兰陵，著书终老。其学术原于儒家，但又吸收和融合了当时进步的思想学说。他的著述很丰富。现存《荀子》一书，共三十二篇。

祭酒：《史记·索隐》言：“礼食必祭

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卿三为祭酒者，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故云‘三为祭酒’。”

⑬吾王：指齐襄王（名法章，湣王子）。

根据有二。其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其二，西汉末，刘向校定《荀子》一书，更名《孙卿新书》，其叙录中说：“孙卿名况，赵人。方齐威王、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由上而条记载看，赋中作为祭酒的荀卿与之对话名，当以齐襄王为宜。

⑭珉珠乱玉：象玉那样的石头能把玉石混淆。珉珠：象玉的石头。乱：混淆。

⑮蓂莠茂者其谷芜：蓂莠等杂草茂盛，那谷物就荒芜。蓂：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毒。莠，狗尾草。蓂莠：比喻坏人。

⑯大道羈孤：宏大正确的学说反而受到

束縛。大道：宏大、正確的學說。羈，羈絆。孤，孤立。

⑮繼軌于唐虞：遵循唐堯、虞舜時期的治國之道。唐，即指堯，堯曾封于唐，故稱“唐堯”。虞，指舜，傳說中有虞氏部落長，炎黃聯盟首領，名重華，他曾封于虞地，史稱虞舜。

⑯德被品物，威加海隅：意思是說德行再加上雄厚的物資，就能威振四海。被，加于……之上。品物：指物資之類。

⑰鳳藻鸛儀，豹文麋質：（他們不過是）把鸛鷹裝飾成鳳凰，用豹皮掩飾着麋鹿的質地。鸛，一種凶猛的鳥，也叫鷓鷹。鳳，鳳凰，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雄的叫鳳，雌的叫凰，道稱為鳳。麋，即麋鹿，即四不象，它頭象馬，角象鹿，身象驢，蹄象牛，但又不全象哪一種動物，故叫四不象。文，文飾，掩飾。

⑱未睹用賢之實也已：未有看到任用賢者的實質罷了。也已：罷了。

譯文

齊王以慕求五帝之風華為樂，盛贊三王

的宏伟功业；使千里外的贤才奇士来到齐国，总括诸子百家的宏伟学说。这时，在四通八达的大路旁，筑起高大的宾馆，使学士的游学更加兴盛，使学者的居处更加壮观。多么壮美呀！高而宽的庭门，高高的房屋飞檐走厦；酒杯及酒壶明亮清洁，桌子整齐而典雅。他们这些人头戴佩有彩带的帽子，脚穿丝织的鞋子；庄重而端正地坐在那里，行为规范而有礼节。他们翘起胡子，纵谈横议，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近则论及孔丘、墨翟，远则追述羲皇炎帝，树立相同的理论及见解，拔除异端之说，辨别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有时无用之材受到赞美，而称之为茂盛之木，美玉反而得到毁谤非议，而成为瑕疵。这正如兰、芷与蒿、莎都分布生长在云梦泽的低湿之地。大雁、天鹅与鸬鹚、鹭鸟都展翅飞舞在渤海之滨一样（天下之士都云集于齐国的稷下）。在这时，齐王喜冲冲地来稷下游赏，欣然自喜，说稷下人才的富有，使天下之美竭尽，他万分感慨，有洋洋自得之意。

祭酒荀卿上前称赞说：“我尊敬的齐王开辟了仁义治国的道路，创设学宫，尊重知

识人才，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广泛治理的那种考虑是很深远的。然而其他诸侯国都不服于齐国，而且相互侵扰，战士有服役出战的怨言，老百姓有忧愁痛苦的声音，我考虑，这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道术浅薄，不能把您的宏谟变成现实的缘故。”齐王说：“先生对我的责备是很深刻的，我希望听完你的全部意见。”荀卿回答说：“象玉那样的石头能够使玉石混淆，鱼目参杂到珍珠之中，能够冒充珍珠，泥沙混入水浪之中，那就使泉水混浊，莠莠等毒草茂盛，那么谷物就荒芜，网如果失去大纲就会失去头绪，行路的人，如果遇到很多岔路，就会迷失方向。现在，是非一样，邪正在同一区域共存，异端邪说竞争前进，正确的学说反而受到束缚。这样，齐国凭着什么跟踪夏禹、商汤两代贤君开创的业绩，继承光大唐尧、虞舜的事业呢？若果真能除去虚假，敦促察明事物本象，修正先代君王的典章制度，遵行大圣的规矩模式，德行加于品物之上，就能威振四海。使忠信正直的人有优越的位次，而对那些奸邪之人疏远、谪贬。即使按照那些贤士的话办事，用他们的办法治国，也不一定使

他们的吃穿过于铺张、奢侈。使我们这些人吃着精美的食品菜肴，享用着不低于君主的俸禄，不如扛着锄，拿着农具（去垦荒种田）做尧舜的信徒。可惜啊！（那些摇唇鼓舌的人）吃的是美食，穿的是华衣，住的是高堂大屋，然而，他们不过是把鸱鹰般的而容装扮成凤凰，把四不象的质地，美化成豹纹，吟诵的是无用的言语，浪费着难得的时光，老百姓的痛苦没有解除，他们却不与之同忧，国家面临着危险，他们却全然不知。我私下认为，大王只是慕求养贤敬士的名声，而没有看到用贤的实质所在罢了。”

简析

《稷下赋》内容充实，语言生动，是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从内容上，全赋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开头至有自得之志矣）写稷下学官的盛况。赋的开头先写齐王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接着写稷下先生所受的优厚待遇，再写稷下学者奋髯横议的情状，最后写齐王目睹稷下学官的兴旺而欣然自喜的情态。第二层：（从祭酒荀卿至结尾）写荀卿的进谏。这一层的开头荀卿首先肯定齐王

治国安民的良好愿望，随之，用大量的比喻讽喻齐王不择贤而用，所造成的“是非一概，邪正同区”的弊端，进而告诫齐王要“忠正修列，谗邪放疏”，起用忧国忧民之士。最后以“臣窃以大王为徒慕养贤之名，而未睹用贤之实也已”，作为全赋的结句而嘎然而止。由此观之，荀卿进谏齐王的中心内容是尚贤任能的问题。

战国时代在齐国临淄的稷下，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少史书有所记载，但以文学的形式对此进行描述的并不多见。从这一点看，这篇赋当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再者，从此赋所写的荀卿进谏来看，稷下学宫不仅是百家争鸣的园地，更可贵的是，稷下学者对齐国的政治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劝谏齐王，为之出谋献策，积极干预齐国政治。刘向的《新序》记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从这个角度看，这篇赋，又是诸多史书所阐观点的佐证。

无庸讳言，这篇赋流露了司马光政治上的保守色彩，深深地打着他所处时代的烙

印。如，他在写到百家争鸣和荀卿进谏时，过多地贬责混入百家的平庸之人，谗邪之辈。显然这是借此嘲讽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让宋皇帝不可听信这些革新者的政见，更不能委以重任。这正是这篇赋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篇赋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以及它的借鉴意义，仍然是十分可取的。它的文史价值，我们不可低估。

注释者：宋玉顺同志，临淄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祭酒荀卿及其教育思想

宋 玉 顺

荀卿（约公元前三一三年—前二三八年）即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汉代避汉宣帝刘询名讳，改荀为孙），赵国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曾游历过赵、齐、秦、楚等地，但是他在当时的文化中心齐稷下学官讲学最长久。他不仅是最有权威的老师，而且“三为祭酒”（学官之长）。

《史记·孟荀列传》云：“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而《风俗通·穷通篇》言：“齐威、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

以上两则资料所记荀卿入齐时间有“五十”与“十五”之别。郭沫若认为，他十五游学于齐，当在齐宣王末年。郭老考证：

“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早。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荀子批判·注》）。这时，正是“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的兴旺之时。大约稷下学宫的一些大师如宋钲、孟轲、慎到、环渊等人，荀子都曾听过他们的讲学。直至齐襄王时，他成为最有资格的老师。“卿三为祭酒者，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史记·索隐》）。

荀子从十五入齐至襄王时为“祭酒”，这期间历经几十年，由此可见，他正是在稷下这块百家争鸣的园地里，博采各家学说，而成为先秦诸子中的集大成者；他又在稷下论坛上，热情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不仅成为稷下先生中的佼佼者，而且在一定阶段组织领导了稷下学者及其弟子的文化教育活动。由北可以推知，他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及其教育思想势必给稷下学宫带来巨大影响。

荀子在天人关系上，首先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哲学命题，这正是他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在人性观点

人性，经过长期的改造不再回复其本来面目，这与孟轲宣扬的教育的作用在于恢复人的本性是不同的。

就教学内容而言，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诗》、《书》、《礼》、《乐》、《春秋》为教材。但他特别强调礼。他说：“《礼》者，法之天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在这里他已经把“礼”看成“法”的总纲，改造了孔丘“礼”的含义而赋予新的内容，要求人们学习，遵守法律纲纪，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礼义，为君子，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自然在封建制度下，起到维护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达到了当时旨在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但他所强调的“礼”、“法”，也正是后世“讲文明”、“守纪律”的张本。

二、教育原则和方法

荀子十分强调学习。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通过学习，知识就会不断更新，人们就会不断进步。

在学习上，他强调“实”，即实事求是，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儒效》）。他认为学习要持老实的态度，不要弄虚作假，装腔作势。不懂装懂，是自欺欺人。在学习上，他也强调“积”。他认为，学习有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要靠日积月累，不能一蹴而就，因而不可操之过急。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他还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儒效》）。荀子这种“积”的观点，已初步具有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萌芽。在学习上，他还强调“恒”。他认为，学习要持之以恒，要孜孜不倦，刻苦钻研，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在《劝学》中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学习上，他还强调“专”。他认为学习要专心致志，精力集中，心神贯注，不可一心二用。他说：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劝学》）。这几句强调的

是，对学习不专心致志，就不能达到融会贯通，不埋头苦干，就不能得到显著的成绩。

荀子不仅十分重视“学”，而且十分强调“行”。他对人的认识 and 实际行动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他又说：“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儒效》）。意思是说，有了知识，不去实行，知识虽多，也没有用处。他强调“行”，说明他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学至于行”就停止了，这说明他的认识论是有局限性的。但荀子指出行动在认识中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荀子不仅重视为学者的主观努力，在获得知识、提高德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重视客观环境对他们的重要影响。他说：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在这里荀子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有重大影响，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

三、教师的作用和修养

荀子对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视。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可见荀子是要教师忠实地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服务的。有时，他甚至把教师的地位放在礼义之上。他说：“学之经（径）莫速乎好（敬爱）其人（教师），隆礼次之”（《劝学》）。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的途径，没有比敬爱贤师更快的了，其次是尊崇礼法。在他看来，尊师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大略》）。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是向师长学习，就能遵守法度而聪明，就能很快明白事理；勇敢的，就很快有威严；有才能的，就很快得到成功；精明的，就很快通晓知识；能言善辩的，就很快形成完整学说。”（《儒效》）。反之，“人要是不向师长学习，聪明的，就必定成为盗；勇敢的，就必定成为贼；所谓有才能的，就必定会作乱；精明的，就一定会很诡诈；能言善辩的，就必定流于荒诞。”

“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

他还认为，师是一切行动的准则。他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大略》）。

由此看来，荀子的“师道”则反映已经掌握政权的封建统治者企图通过礼法与师道的结合去实行专制统治的要求了。

荀子在教师修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意见。他说：“师术（标准）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谦虚），可以为师；耆（六十岁）艾（五十岁）而信，可以为师，诵说不陵（不超过学生接受能力）不犯（不犯礼），可以为师；知微（精）而论（讲透），可以为师”（《致仕》）。这就是他特别重视教师的品格，丰富的经验，循序渐进的教法与精微的表达能力。他所说的“博习不与”，不是说教师不要博习，而是说做教师光博习还不够，重要的是符合这四条标准。这是荀子长期为师的经验之谈。

四、学生的道德修养

荀子十分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他认为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彻底改变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德操，以使之合乎礼法的要求。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道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劝学》）。意思是说：“君子认为学习得不全面不精粹就不能称为完美，所以按照学习的程序去读书，并把它们前后连贯起来，认真思考所学到的东西，使之融会贯道。按照老师的榜样去身体力行，除掉不合礼法的过失，树立培养高尚的道德。这样通过学习，使自己只喜欢看与听关于礼法的东西，说和想关于礼法的事。这样就能做到不为权势利禄所动摇，正是心有主宰，不因外界事物的干扰而改变。从生到死都坚守着礼法，这就叫做具备了高尚的德操。”这也就达到了他所理想的培养

目标，实现了他的教育目的。

此外，他要求学生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老师。在老师面前，要做到“礼恭”、“色从”、“辞顺”。这和他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是一致的。甚至对于学生平时的穿着仪容都有明确规定。他说：“其冠进（帽子向前戴），其衣逢（衣服要宽大），其容恂，佺然（朴实的样子），恂然（温顺的样子），辅然（亲近的样子），端然（端正的样子），察然（态度明朗的样子），洞然（恭敬的样子），缀缀然（规规矩矩的样子），瞽瞍然（尊重别人的样子）。是子弟之容也”（《非十二子》）。这些要求，实在可以视为荀子给学生制定的守则。

总之，荀子的教育思想适应变革的时代要求，而在与诸子论辩过程中，并吸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是逐步得以完善、系统起来的。其中有不少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有着积极进步的作用。其某些教育原则、方法和他倡导的“尊师重道”的精神，在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足以借鉴发扬的新意义、新精神。

淳于髡其人其事

王德敏 周立升

稷下学宫中有位著名人物名叫淳于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可见他是稷下先生中的一位前辈。但是由于他没留下专门著作，关于他的身世的记载也不多；加之司马迁又把他同俳优之类人物一起列入《滑稽列传》，似乎他只是一个滑稽玩世的人物。因此，对他的思想学说，历来缺乏系统的论述。今天我们要研究稷下之学，却不能不对他的思想进行一番探讨。

一

淳于髡，齐国人。其事迹最早见于齐威王初立之年，他以“国中有大鸟”的隐语讽谏威王。邹忌受相印后，他又以“稷下先生”的资格率徒进说邹忌。威王即位在前元前三五六年，此时淳于髡先生似应三十开外

了。他最后一次出现于史籍中是同孟子的辩论。齐宣王八年，即公元前三一二年，孟子辞职要离开齐国，淳于髡讥笑孟子“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据此可以断定，淳于髡主要活动于威、宣王之世，约生于公元前三八六年前后，卒于公元前三一〇年左右，与孟轲、孙臆同时或稍长些。

关于淳于髡的身世，司马迁只说了一句“齐之赘婿也”（《史记·滑稽列传》）。按古代的“赘婿”和今天的“女娶男”地位大不相同。秦代的赘婿和商贾一样受到压抑和惩罚。汉代则把赘婿同有罪逃亡的官吏并列遣戍边疆。这是因为赘婿出身贫贱，自无户籍，只能依妇家为籍，如寄生的赘疣一样，故遭到地主阶级的鄙视。有人认为赘婿就是“家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淳于髡为人家奴考》），固然失之武断，但赘婿属卑微的社会下层，却是可以肯定的。不过齐国的风俗习惯与其他各国有所不同。据历史记载，自春秋时代齐国就有一种特殊的风俗，民家的长女不得出嫁，称为“巫儿”，主持家中的祭祀。因为有这种风俗，所以又盛行“赘婿制度（童书业：《春秋史》）”。

这无疑给出身卑微的淳于髡一跃而为名冠稷下的“列大夫”减少了社会舆论的阻力。

身为赘婿的淳于髡能够受到齐王的尊宠，决不是偶然的。正如同被刖足的“刑余之人”孙臆，并没有被齐王按照习惯当作卑贱的“非人”弃而不用，反而破格任命为军师一样，除了他们具有特殊才能的主观条件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淳于髡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此时，各大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继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田氏也借助于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于公元前三八六年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姜氏国君而自立为侯，建立了田氏统治的齐国。接着，秦、楚、燕等国也先后跨入了封建社会，从而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割据局面。齐国地主阶级为了在列强斗争中取得胜利，便积极选贤任能，进行社会改革，以增强国势。如魏文侯任用李悝，赵烈侯任用公仲连，楚悼王任用吴起等，对经济、政治、军事进行改革，相继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但是，“田氏代齐”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旧贵族的保守势力比较大，只

顾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社会改革却进展甚微。特别是齐桓公（田午）在位的十八年中，骄奢淫逸，出现了“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的严重局面（《史记·滑稽列传》。自公元前三七三年至公元前三六〇年，先后受到魏、赵、燕等国的七次攻伐（按司马迁将这段历史误记在齐威王的帐上，与史实不符）。在这种“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危急关头，以继承桓文余烈自诩，抱着宏图大志的齐威王即位了。他代表着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任贤使能，改革内政外交，励精图治。首先任用深明治国之道的邹忌为相，又以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增强军事力量；同时大力兴办稷下学宫，聚集百家人才，进行文化思想统治。淳于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

二

稷下先生们素来以“不治而议论”著称，即所谓“不任职而论国事”，通过聚徒讲学，上说下教，著书立说的方式“以干世主”。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活动，被授予上大夫、上卿之类的官爵。淳于髡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不仅经常“议论国事”，而且在宫廷中“任职”；不仅是出入王宫的高级谋士，而且是一位外交活动家。

（一）讽谏威王，振兴齐国。

齐威王初立之时，似乎仍象他父亲那样“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在这内乱外患，国势危机，而“左右莫敢谏”的关键时刻；淳于髡以“止于王庭”而又不飞不鸣的大鸟讽谏威王，迫使威王下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决心，“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从此“盛行三十六年”（《史记·滑稽列传》）。在齐国振兴之后，淳于髡又以饮酒为喻，用“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的道理告诫齐威王胜而勿骄，要居安思危，威王心悦诚服，“乃罢长夜之饮”，齐国大治（同上）。

（二）敦促邹忌，进行改革。

邹忌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齐威王即位不久，他就“以鼓琴见威王”，以

琴弦的特点和节奏的协调来说明“治国家而弭人民”的道理，受到威王赏识，三个月后被任命为相国。淳于髡很赞扬邹忌的才能，便率领弟子以“微言”进说邹忌。实际上是主动与邹忌讨论治国方略，敦促他大胆进行政治改革。宾主讨论的结果，确定了上对国君，下对臣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忌以“谨受教”、“谨受令”的谦逊态度，接受了淳于髡的意见（《新序》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

（三）日荐七士，推举贤才。

《战国策·齐策三》记载，“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宣王觉得一朝而见七士似乎太多了。淳于髡讲了一番物以类聚的道理之后，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多多推荐，“岂特七士也”。可见，在为齐国推举良才，选贤任能方面，淳于髡做了不少工作。

（四）调和君臣，维护统一。

在田婴为相期间，曾利用职权大营其私，在自己的封地薛筑城，号称薛公，终因民怨鼎沸而被宣王免职。其子田文承袭所封薛地，号称孟尝君，继续结党营私，同王室闹独立

性。后来楚国乘机攻薛，孟尝君恐惧，恳求淳于髡向齐王求救。淳于髡以大敌当前应以社稷为重的道理，说齐王，使齐王“疾兴兵救之”（《战国策·齐策三》），从而调和了君臣矛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吕氏春秋·慎大览·报更篇》亦载其事）。

（五）止齐伐魏，免遭战祸。

齐国强盛起来以后，想讨伐魏国。淳于髡先向齐王讲了个寓言：一只疾犬拼命追逐一只狡兔，结果“犬兔俱罢，各死其处”，而“无勤劳之苦”的田父倒坐享渔人之利。接着他向齐王指出：“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明白了利害关系，于是“谢将休士”，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有害无利的战祸（同上）。

（六）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淳于髡曾多次作为齐国的特使与诸侯周旋。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齐威王时，“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救兵”。他说服齐王以厚礼馈赠赵国，结果达到了预期目的，“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史记·滑

稽列传》)。另一次是“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刚出城门鹄就飞了。但他不慌不忙，“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使楚王感到他忠诚可爱，羡慕“齐王有信士若此哉”！不仅不以失鹄而恼怒，反而“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同上，褚少孙增补），加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出使任务。

由于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的外交才能和功绩，齐威王曾“以髡为诸侯主客”，即任命他为专司接待外宾的官职。此外，据《说苑·尊贤篇》载，齐威王还曾“立淳于髡为上卿”，“与平诸侯之事。”该篇又称“博士淳于髡”。“博士”官在当时一些国家已经设立，鲁国设置较早，如《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齐国设置略晚，《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但在稷下先生的七十多位“上大夫”或“列大夫”中，被封为博士官的，除淳于髡外，还没有见到其他人的有关记载，难怪他被列为稷下之魁首了。《太平寰宇记卷十九》曾引证《史记》（非今本）说：“髡死，诸弟子

三千人为纆经”。给他带孝送葬的弟子如此之多，足见其德高望重。

总之，淳于髡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又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活动家；既是国内方针政策的谋划者，又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三

关于淳于髡的著作，世无传本，《汉书·艺文志》里也没有著录。金德建曾对此作过一番考证。认为汉人曾见，如今已佚的《王度记》乃淳于髡所著，并辑录了《王度记》的佚文十则（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四十一》）。其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司马迁和应劭都说过包括淳于髡在内的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咸作书刺世”；二是《礼记·杂记下·正义》引刘向《别录·王度记》云：“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我们认为这两条都不足为证。前者只能说明淳于髡也应有所著述，但世人并未见其书，故难以肯定他有著作传世；后者刘向先用了一个“似”字，说明他对《王度记》的作者只是一种推测，接着又用了“等”字，更说明了这种推测的或然性。其

实，刘向说“淳于髡等”，如同司马迁说“自如淳于髡以下”，应劭说“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一样，都是盖称和泛指。从《王度记》的十则佚文来看，正如金德建所指出的，其内容都是属于礼节制度方面的记录，主要讲天子、诸侯、大夫、庶人之间的种种礼制，其性质和《礼记》中的《王制》篇类似而更单纯。其实这正是同淳于髡的思想主流不一致的地方。

淳于髡虽然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言行中，窥见其思想学说的主要倾向。对此，司马迁就曾经做过简要的概括，他说：“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一本作“陈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

（《史记·孟荀列传》）这当然不够全面，然而结合上述淳于髡的生平事迹来看，却大体揭示了他的治学特点、理论渊源和主要倾向。有人根据“学无所主”，断定淳于髡是一位“无所谓派”，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杂家。这都是把“学”字训为“学说”了。其实，这句话是承接上文“博学强记”面言，指的是学习、学识方面。由于他博学强记，

兼容并包，无所不涉；其学识才渊博广泛而不固执一端。正是由于他的这一治学特点，才使他能言善辩，左右逢源，同“天口骈”、“谈天衍”、“雕龙奭”并列，博得了“炙毂过（车果）髡”的美名。他用以讽谏的各种隐语和寓言，他同孟子辩论中涉及的历史知识，他的随机应变的外交辞令，以及梁惠王“一连语三日三夜无倦”的马拉松式的长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淳于髡的治学特点是“博”，但他的思想学说并不“杂”，他不是什么“杂家”，而是有鲜明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倾向的。其政治思想是立足于法家的政治改革理论，主张以法治国；其哲学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又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而这些思想内容是通过其独特的灵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淳于髡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言行都是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封建政权服务的。在他以“微言”说邹忌的那段对话中，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邹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

全亡’。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猱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这次对话，淳于髡共讲了五句“微言”，即打了五个比喻，以“陈述”他的“愚志”。结果，邹忌“若响之应声”，可见邹忌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并用“谨受令”表示完全赞成他的主张，说明两人观点一致。前两句是说为臣的要忠于君主，小心谨慎地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以使国家昌盛；第三句是说要随时弥合上下左右及臣民之间的裂痕和缝隙，不

要背离万民；第四句是说举荐官吏要选贤任能，谨防不肖之徒混杂其中；最后一句是关键，即认真修订法律，严格监督和消除奸吏，实行法治。

关于淳于髡与邹忌的这次对话，刘向《新序》中也有内容大体一致的记载，但只记了“三称三应”。除“狐白之裘”一条相同外，另外两条是：“淳于髡曰：‘方内而员缸，如何？’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

很明显，淳于髡的这些致治思想是为了建立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提出的。它同较早的魏国、赵国、楚国的变法及同时的韩国、秦国的改革，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其大同方面如李悝制订《法经》；公仲连“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吴起削减“上逼主而下虐民”的奸臣冗吏；申不害主张“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使群臣跟着国君转）等，都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主张。其小异方而如吴起不准纵横家在楚游说，商鞅

抑制秦国的投机商人，把辩知、游宦、文学之士称为“淫道”而一律加以排斥等。这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及其他主、客观条件不同所致。

由于齐威王推行法治，对于即墨大夫那样忠于职守，治国有功的县令给以重赏，对于阿大夫那样欺下瞒上，贿赂求荣，以致造成“田野不辟，民贫苦”的奸吏，施以严刑，确实做到了“谨修法律以督奸吏”；使“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实践证明，淳于髡的政治思想是顺乎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

战国中期，儒、法两家关于礼治和法治的斗争趋于激烈。儒家孟轲站在保守的方面，用“仁义”之类不合时宜的空谈及对法家注重实际功效的社会改革。为此，淳于髡与孟轲进行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淳于髡针对“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质问孟子：假若嫂嫂掉在水里要不要用手去拉她？孟子用常规与权变的关系作了回答。淳于髡接着问他：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你

不去援救，又是什么缘故？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孟子言行不一的空谈。当然孟子仍旧用他的仁义之道来辩解（《孟子·离娄上》）。第二次，针对儒家的“仁”，淳于髡指责孟子：你作为齐国的三卿之一，可是并没有建立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功业，“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象鲁缪公那样重用儒家，结果鲁国削弱得更厉害了，这种“为其事而无其功”，丝毫“无益于国”的儒家，能算是“贤者”吗？孟子只好用“君子所为，此人固不识也”来搪塞了事（《孟子·告子下》）。从淳于髡同孟子的两次辩论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反对儒家的迂阔说教，而注重切实“有益于国”提倡功利主义的鲜明立场。

从他们两人的思想渊源来看，这种分歧并不是偶然的。孟子心目中最敬仰的是孔子。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在思想上继承了孔子的衣钵。而淳于髡则不同，司马迁说他“其谏说（一本作陈说），慕晏婴之为人也”，一语道破了他的思想学说的渊源。晏婴是春秋

末期齐国灵公、庄公、景公时的三朝宰相，是一位杰出的开明政治家。据《左传》、《史记》、《晏子春秋》等书记载，他敢于“谏说犯君之颜”，大胆批评国君，关心人民疾苦。他聪明，机智，出使各国，不受侮辱。淳于髡在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中的确是处处以晏婴为榜样的。然而更重要的，即作为这一切的理论基础的，则是其哲学上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四

淳于髡同晏婴一样没有哲学专攻，他的哲学思想也是通过其政治、伦理的说教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鲜明的无神论倾向。

自春秋以来，无神论思想相当活跃。春秋末期的晏婴反对迷信，具有无神论倾向。当齐国上空出现慧星时，他反对禳灾；齐景公生病，他反对祝祷，认为祝史祈祷只能说谎，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淳于髡继承了晏婴的这一“陈说”，对祈祷丰收的“禳田者”予以无情的嘲笑。当楚兵伐齐，威王使淳于髡赴赵求援时，他嫌带的礼物太少，便以

“禳田者”的奢望为喻来讽谏齐王，他“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肠蹄，酒一盂’。祝曰：‘瓠窋满篝，汗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的本意是要用这个比喻讽谏齐王小气，出礼太薄，但在这里却同时表现了他对“禳田”这种迷信活动的否定态度，因为即使“禳田者”所操肠蹄和酒再多，仍然是一种“所持者狭而欲者奢”的妄想。可见，他的无神论倾向同晏婴一样，是鲜明的。

（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从西周末年就有关于“和”与“同”的争论。“同”是指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不会产生新内容；“和”是不同事物或方面相结会而得到的新的统一。晏婴反对“同”而赞成“和”。他说：“若琴瑟之专，谁能听之？”只有五音六律“出入周旋以相济”才能成其乐章（《左传·昭公二十年》）。淳于髡继承了晏婴这一辩证观点并有所发挥。他说：“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位；琴瑟不

较，不能成其五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较”即较量，亦即《老子》“长短相较”之意，是说大车如果没有虚实、轻重等方面的鉴别较量，便不能承载一定的重量；琴瑟如果不进行粗细、高低等方面的配合，便不能奏出和谐乐章。这说明不同事物或方面都是相比较面存在，相对立而统一的。不过，晏婴关于“和”的理论是为他的忠谏作论证的，请国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淳于髡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关于“较”的观点，有严格区别是非、善恶、赏罚之意，作为其“谨修法律面督奸吏”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淳于髡关于“和”与“较”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具体的形象比喻的话，那末，他关于“物极必反”的对立转化思想则已提高到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了。他讽谏齐威王时指出：“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史记·滑稽列传》）。就是说，世界万事万物发展到极点，无不向其对立方面转化，为避免各种不利的转化，就要注意“不可极”。这是个很精辟的观点，是对《易经》、《老子》中的

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运用和发挥。

(三) 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司马迁说淳于髡以“承意观色为务”，这是说他的特长。很多人把这句话解释为阿谀奉承，专门看主于的脸色行事。这是望文生意的解释，是同淳于髡的事迹人格不符合的。其实，“承”字的古义很多，除有“奉”、“迎”之义外，还有“举”、“接”等义。联系到淳于髡关于事物“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基本观点（《孟子·告子下》），这句话应解释为：他擅长于透过事物或人的外表形色，来观察事物的本质或人的心理，即由表及里，以见知隐。这正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表现。具体地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观其色而知其情，即从人们的外表形色洞察其内心情志。他会见梁惠王的故事便足以说明他的这一认识和能力。“客有见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客曰：‘子之称淳于髡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其寡人不足为言也？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

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来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史记·孟荀列传》）。这个故事可能说得有些夸大，淳于髡的“心理学”未必能如此精湛，但以此说明他的“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及其由表及里的认识路线，却是很典型的。

二是听其言而循其行，即以人们的思想言论推测其活动行迹。如前述淳于髡同邹忌的那次对话，在进行了五次问答之后，淳于髡便断定邹忌“必封不久矣”，结果不出所料。为什么他能比较准确地预言呢？因为他从邹忌回答的五条政治原则，看出了邹忌是一位深明治国道义又有魄力的改革家，所提出的原则和措施一定会卓有成效，必然受到齐王的封赏。

象这样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认识方法，在当时受到不少哲学家的重视。甚至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惜诵》中也写到：“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故相臣莫君兮，所

以证之不远。”这说明在他们看来，情与貌、言与行都是统一的，是有迹可循的。在这里体现了他们对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关系问题的初步探讨，而淳于髡是很善于运用听言循行的方法的。

三是察其事而审其功，即人们办任何事情必有一定功效，事与功是一致的，故可以从社会效果审察其人其事。他同孟子辩论时指出：“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孟子·告子下》）。这段话是很精辟的，它不仅揭示了事物本质与现象，即“内”与“外”的必然联系，而且指出了判断“贤者”的标准不是主观的武断，应是客观的“事功”，即看其是否能“益于国”。这同墨子的“三表”之一——“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观点是一致的，说明淳于髡的认识论中，也接触到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问题，明显地带有唯物主义倾向。

（四）察类、类比的逻辑思想。

淳于髡以“滑稽多辩”著称于稷下，是有名的“辩者”。在当时的社会大变动和百家争鸣中，各家都注意研究名实关系，名辩理论等逻辑问题，但不一定都属于“名家”。淳于髡不是名家，他的逻辑思想是同他的认识论和政治实践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对“类”的明察和类比推理的运用上。

“类”的概念是墨子首先提出来的。他用“察类”的理论反驳论证，进而发展为“察类明故”和“类比”推理的方法，以明是非，审异同。淳于髡在此基础上，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了“畴”的概念。在上述他一日推荐七士的故事中，为了回答齐宣王“士不亦众乎”的问题，他说：“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至鞞黍、梁父之阴，则郛车而载矣。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战国策·齐策三》）。在这里，淳于髡首先区别了不同翼的鸟，不同足的兽这些个别事物，然后又概括为“同翼者”、“同足者”的不同类型，及其“聚居”、“俱行”的特殊规律，最后抽象出“物各有畴”的一

般结论。这就自觉地把问题上升到哲理高度了。

抓住了事物的“畴”，就抓住了事物最本质的属性和共同规律，就能更好地“察类”和“类比”。在上例中他以此说明为什么他能一日荐七士，在他“献鹄于楚”的故事中他以此为已辩护。他借以讽谏的各种隐语、寓言，如大鸟之志，琴瑟之音，犬兔之斗，攘田者之欲等，都是这种类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这种逻辑方法成了淳于髡独具特色的一种斗争艺术，在论证和推行他的思想学说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于淳于髡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学说，由于书阙有间，我们只能做以上简略的论述。我们认为，按照传统的“九流十家”分类法，他基本属于法家一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他不象完全排斥仁义的商鞅那样极端，而吸收改造了重视“君臣之礼”的儒家的部分思想；他重视社会功利，反对两败俱伤的战争，和墨家有某些共同之处；他的“事不可极”的观点和“欲取先与”的策略，又同道家相类似；他的“察类”、“类比”的逻辑思想可同名家相呼应，而其丰富多采的微

言、比喻更可同“街谈巷语”的小说家相比美。总之，他的思想学说不是“无所谓”，而是有所主的；他不是杂家，但又吸收了各家的特长，为他的治法理论服务。这可能是齐法家的共同特色吧！

淳于髡思想学说的这一特点，自有其形成的主、客观条件。除了他“博闻强记”的主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当时齐国的社会历史特点以及作为百家争鸣的中心环境所决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让我们另文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作者：王德敏同志，山东农机学院副教授
周立升同志，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爱国志士王蠋

宋玉顺

王蠋，战国时齐画邑（今临淄城西北桐林、朱台一带）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二八四年。他生活的年代当是齐宣王、湣王之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于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王蠋就是在齐国这种学士云集，百家争鸣的环境里成长，涌现出的有胆有识之士，后被宣王任为太傅，担负了教化培养太子田地（后来的齐湣王）的重任。

湣王执政初期，尚能勤于治国，招贤纳士，博取臣子及学宫之士的治国之策。但后来逐渐发展为好大喜功，骄横拒谏。正如《盐铁论·论儒篇》所言：“湣王即位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而摧三晋，却强秦……”

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皆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入薛。”面对潘王的倒行逆施，王蠋曾多次进谏，劝其对外息兵止戈，对内注重发展经济，安抚百姓。但潘王对王蠋的谏言听而不闻，仍一意孤行。就在稷下学者纷纷去齐的情况下，王蠋也愤然辞官，离开国都临淄，退居故乡画邑，布衣为农。

公元前二八四年，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赵、韩、魏四国之师，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占了齐国都城临淄，并破齐七十余城。潘王仓惶走莒，后被楚将淖齿所杀。当乐毅欲破画邑时，王蠋动员乡亲，拿起武器，决心与入侵者拼死一战。乐毅慑于王蠋的威望，“令军环画邑三十里无入。”已而使人谓王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以诱其降，蠋大义凛然，严词拒之。当燕人以“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威胁时，王蠋愤然斥责：

“齐王不听吾谏，故退面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史记·

田单列传》)。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

王蠋为国悲壮而死的事迹震动了齐国，鼓舞了齐军民的抗燕斗争。齐之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这时少年爱国英雄王孙贾在莒城右袒（脱去右膀衣服）；率四百名百姓，擒淖齿刳为肉酱。并与群巨百姓坚守莒城，立太子法章为襄王。田单则在即墨与百姓同仇敌忾，以“火牛阵”大破燕兵，经过浴血奋战，燕所下七十余城，先后光复。从而谱写了古齐历史上，最为高昂悲壮的爱国篇章。

爱国志士，一向是被历代人民所敬仰、赞颂的。王蠋死后，人们把他埋葬在现在的召口乡东召口村东南。后人竖有“齐忠臣王蠋之墓”的碑志。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写了《王蠋论》称颂王蠋之志，“足以无憾于天，无忤于人，无欺于伯夷比干之事”。北宋思想家李觏有七言绝句赞王蠋：“全齐拱手授燕兵，义士谁为国重轻。七十二城皆北而，一时忠愤独书生。”明代又竖碑，由著名史学家徐一夔撰写碑文，盛赞王蠋的报国之志。清代诗人王

心清写有《王蠋墓诗》赞曰：“不受甘言诱，宁惊敌势张。贪生羞龊龊，绝胆厉刚方。贾（王孙贾）臂呼能奋，单（田单）牛火倍光。一夫明大义，千里复全疆”。民国时，因碑文剥蚀而不辨，又竖“齐烈士王蠋墓”碑。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梁启超也撰有论文，谈及王蠋之死的巨大影响及意义。至今，虽经二千二百多年的春风秋雨，沧桑之变，王蠋的陵墓仍然高高地矗立着。墓碑上书写的“齐烈士王蠋之墓”的几个大字，仍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以此足见，人们对他的敬仰之情，以及他精神的感人之深。

稷下人物小传

王玉江 刘文熙

稷下人物，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有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六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除上述人物外有孟轲、荀况、邹忌、邹奭等四人，该篇中另外提到与稷下有影响关系的人物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以及墨翟等七人，他们的生平活动年代较早，是否为早期的稷下人物，无资料可寻，但他们的学说思想对稷下产生过一定影响，则是事实。这篇所记述者纯属稷下人物，若仿照《仲尼弟子列传》的体例，这篇定名《稷下人物列传》也许更为妥当；另外《史记·田单列传》中附列王蠋（注：系与稷下同时代的人，又有英烈的爱国事迹）；《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有鲁仲连、徐劫、田巴等三人；《汉书·艺文志》除上述人物外，又多出宋钲、尹文，（附彭蒙）；《庄子·天下篇》多出彭蒙、季真为稷下先生；近

人据《战国策》、《说苑》、《韩非子》等书，又认定王斗、儿说、颜觸、唐易、公孙固、田过、列精子、匡倩、告子、黔娄、孔穿、能意、间丘先生等为稷下先生。但因书间有缺，史料难征，要求详实具体，确有相当难度。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是以齐稷下复盛，且数百千人”。就这段文字看，稷下人物列上大夫者，就有七十六人之多，这应该属于上层人物，即所说的稷下先生；“数百千人”则应该是稷下的一般学士。史书缺略，记载欠详，也许是大史公司马迁，因其人数众多，也就“岂可胜道哉”一语概括了。但就“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和“览（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的心理状态看，一方面，天下有声望的学者，均在齐宣王罗致之列，希望他们能够为齐国的霸业，出谋划策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也想藉此以炫耀于天下，宣传齐国的人才多，并且欢迎他们到齐国来。这样如游说之士苏秦、苏代兄弟，经常出入齐国；孙臆由魏脱逃来齐，应

该属于稷下人物是毫无疑问了，诸如此类者为数定然不少。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这也正符合他们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他们“合则留，不合则去”，“去来自由”。如此的组合，毫无强制约束的关系，其人才的结合也就容易了。再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和“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的崇高地位和优厚待遇，也很具诱惑力，会为一般士人所向往。孔子的弟子子夏（曾是魏文侯，李悝等的老师）曾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在那个学术自由风气大开的时代，是很有其代表性的，“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一举成名，平步青云者比比皆是；“仕而优则学”的政府官员，为了获得地位、职称、荣衔（“博士”之名，这时已有。《说苑·尊贤篇》有一段记述：汉初叔孙通任博士而号“稷嗣君”，如此之例甚多），为了钻研学术理论，学习政治技能，参与稷下的活动，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也应该视为当然的事。孟子“从者数百人”在这些徒从中，如告子、公孙丑、万章、公明高以及他

的朋友景丑等，大多是齐国人，他们服膺孟子学说，自然是稷下学宫中儒家学派的学士，其他学派者，自然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数百千人”实在算不得夸张。只是年代久远，史料无征而已。

兹谨就史料所及者胪列于下，以供参考，其中有部分人物生卒年代，所持说法不同。我们以《辞海》所记为据，请见察。

孟轲（公元前三七二年——公元前二八九年）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他提倡“民贵君轻”之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反对武力兼并，主张“王道”，行“仁政”。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人人都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提出有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他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认为“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由于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孟子·公孙丑上》），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宋儒有很大影响。被认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著作有《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现存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他一生曾二次来齐，均受到齐王的礼遇。晚年，由梁来齐，齐宣王尊他为上卿，受到崇高的礼遇，他与齐宣王谈“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见齐宣王于雪宫时，因地制宜地阐述国君“与民同乐”的思想，并与淳于髡辩论“礼”。他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强调“王道”行“仁政”，因“天下方务于食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荀卿列传》），他“以所如者不合”去齐，与弟子

万章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年——公元前二三八年），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时人尊称为“卿”，汉人因避宣帝讳，简称“孙卿”，赵国人，十五岁来齐游学，曾三度出入稷下，为祭酒（稷下学宫的负责人），晚年去楚，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史记》说他在稷下学宫任列大夫，“而三为祭酒焉。”他在齐襄王时在稷下，因田骈等已死，他“最为老师。”《荀子》一书三十二篇（《见汉书·艺文志》），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先秦文献中的重要典籍。

荀子的《天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天行有常，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人应该“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他的“人性”观点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必须用政教——礼仪的方法来予以变化。他尊崇孔子，认定孔子是继承周公的礼制的，他同属儒家学派。他认为“礼是表也”，是标准和准则，它一方面能“化性起伪”（性和伪是荀子的特用术

语，他说“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他说的伪只能是一个教育改变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从而产生了法律。

（《荀子·礼记篇》）

他特别重视教学，专门写了《劝学篇》，劝人学习儒家的礼、乐、《诗》、《书》、《春秋》。晚年，赴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著书终老此地，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肯定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自然运行法则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但他的宇宙观也有着循环论色彩，肯定“天地始者今日是也”，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他承认人能通过“天官（感官）”和“天君（心）”的知觉作用认识客观世界，并强调思维对于感觉的优越性。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为要获得全面的正确认识，必须使心“虚壹而静”。但错误地把“心”看做“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面无所受令”，并推论

出君子（统治阶级的人）是“理天地”、“治万民”的主宰。这与他的“化性起伪”观点，建立了他的礼治和法刑相结合的政治观。有《荀子》三十二篇，内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

邹忌 齐人，生卒年代不详，他的主要活动当在齐威王时期，即公元前三五七年——公元前三二〇年。他初以鼓琴的道理说齐威王，他以琴音比喻君、相、政令、四时，他说：“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战国策·齐策》），因之被任为相国。他以亲身体会的人际关系，以“与徐公孰美”，讽喻齐王纳谏。以致齐王广开言路，纳谏除弊，诸侯皆朝于齐，所谓“战胜于朝廷”。他受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称成侯。

邹衍（约公元前三〇五年至公元前二四〇年）齐国人，战国末期哲学家，阴阳学家的代表人物。历游魏、燕、赵等国，受到诸侯“尊礼”，“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

变（辩）”，提出“五德终始”说，把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盛称“祝祥度制”，后来成为两汉谶纬学说主要来源之一。研究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提出所谓“九大州”说，论证中国（他称为“赤县神州”）只是全世界八十一州中的一州，每九州为一集合单位，称“大九州”，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州”另有大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因其谈论天事，当时人们称他为“谈天衍”。邹衍的这种宇宙观，扩大了当时人们的心胸和眼界。《汉书·刘向传》邹衍有《重道延命方》一书，这是一部医药养生的书，这证明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是与邹衍有一定关系。《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皆不传。注：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邹奭 齐人，约后于邹衍。是邹衍五行说的继承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采邹衍之术以纪文”，齐人称邹奭为“雕龙奭”，据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

录》：“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用以指善于撰写文章，他把邹衍的五行说表述得更具体更细致。《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奭子》十二篇，又列有《公枲生终始》十四篇。

淳于髡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生卒年代不详，大致与孟子同时。齐威王在稷下招揽学者，被列为上大夫，多次讽谏齐威王，改革内政。《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喜隐语，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理政事，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飞亦不鸣……”，而激发了齐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大力改革。在与齐王饮宴中，他因地因时而制宜地委婉提出“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的道理，谏齐王罢长夜之饮。当齐王派他赴赵国求援时，他风趣地说“瓠羹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的话，讽喻所施者少，而所欲者奢。因其语言辩捷，足以乱异同（《史记·索隐》）。太史公司马迁列入《史记·滑稽列

传》中，他的逸话很多，却没有著作传世。当时齐人称他为“炙毂𦉳髡”。𦉳（guò）过）车上盛润滑油的小壶。炙𦉳：古时车上盛贮油膏用以润滑车轴的器具，叫𦉳，𦉳经热则油流出。刘向《别录》，“言髡智不尽如炙𦉳也”。左思《齐都赋》注曰：“言其多智难尽，如炙膏过之有润泽也”。后到魏国，魏惠王拟任为卿相，他辞去。

慎到（约公元前三九五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战国时法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崇文总目》作三十七篇，已失传。现仅存其辑录七篇，收入《守山阁丛书》和《百子全书》。另有《慎子内外篇》（《四部丛刊》本）系伪作。

《史记》说他和环渊等都是“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但《汉书》则列之于法家。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把老、庄、申、韩并列，就是体现这种关系的。从道家过渡到法家，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慎到。慎到和道家同样主张君王要“无为而治”，怎样能达到无为而治，就是君王要凭借“势”来做保

证。他以为“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他所说的“势”就是因道立法，只要建立一套公道的法律，上下按法律办事就行了。“无劳之亲，不任子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篇》）。要求官员“以死守法”，人民“以力役法”，那末，“大君任法而弗躬为，而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篇》）。这样君王就不必事事“躬为”，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在这个观点上，他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他的引道入法的关键作用，是我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环渊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环渊著书上下篇也”。《汉书·艺文志》记载：“蜎子，名渊，楚人，老子弟子。”有《蜎子》十三篇，已佚。郭沫若先生谓环渊即关尹，复说关尹，曾为函谷关尹，姓尹名喜。《吕氏春秋·不二》称“关尹贵清”。《庄子·天下篇》把他和老聃并列，赞他们是“古之博大

真人”。他主张“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做人要“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所以他“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在基本思想上与老聃一致。《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注：“名喜，为关尹”。因《汉书·艺文志》另有录《蜎子》十三篇之记载。依此也难以认定环渊与尹喜为一人。

田骈 齐国人，为齐之稷下先生。战国时哲学家，生卒年代不详，先子荀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田骈之属皆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就此证明他卒于公元前二八三年以前，也正是乐毅伐齐时期。据《庄子·天下篇》记载，他和彭蒙、慎到同为一派，主张“贵齐”（强调事物的均齐、而一），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是非的考虑，“与物宛转”，不持己意。这些看来玄虚和大而无当的理论，却对我国学术史上思辩能力的提高，和对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有其贡献。《汉书·艺文志》著录《田子》二十五篇，注：“游稷下，号天口骈”。因他开口尽是讲天下万事万物，当时齐人给他这样一个绰号。

彭蒙，即田骈的老师，也是齐国人。战国时期的哲学家，相传他以其师说授予田骈，认为“古之道人”主要是能做到“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庄子·天下篇》）这种思想与庄子“齐是非”说相近。

接子 齐人，（又名捷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捷子》二篇，列道家，其他事迹不详。

宋钘（钘jian尖），又名宋轻，宋荣，战国时宋人，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列小说家流。另注：“孙卿道家子，其言黄老意”。他曾游历秦、楚等国，在齐宣王时，曾在稷下讲学，与孟子辩论过，他本人很刻苦、节约，到处说教宣传“禁攻寝兵”主张。他以“利”，劝说秦、楚息兵。荀子说他“其言足以欺惑愚众”，他提倡“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庄子·天下篇》），主张认识事物，首先要破除（“别”）成见（“宥”），提出“情欲寡”、“见侮不辱”和“使人不斗”说，主张压抑感情欲望，不以被欺侮为耻辱，达到“使人不斗”的目的。

公孙龙（公元前三二〇年至公元前二五〇年）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字子乘，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反对诸侯间兼并战争，在当时“坚白同异”的辩论中，他和惠施的主张不同，但同属名家。

它的名辩论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多条。认为石头的“坚”和“白”两属性是可以互相分离的。“白马”和“马”存在特殊和一般的差别，是不同概念，不应混淆。着重分析了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贡献。由于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具体同一性，不免陷入形而上学的诡辩。《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

李悝 有说即李克，（公元前四五五年至公元前三九五年）战国时法家。孔门子夏弟子，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喜平糶”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

实行法制，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其言论见于《汉书·食货志》、《晋书·刑法志》。《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列法家，已佚。《汉书·艺文志》另在儒家中有《李克》七篇，今佚。

尹文 战国时人，和宋钲齐名，同游稷下，善名辩。《汉书·艺文志》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据《说苑·君道》载：他主张“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事寡易众，法省易因”，人君应“无为而能容天下”，他曾对齐宣王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他从“尚法”的现点出发，为“见侮而不斗”的主张做辩护。并进而提倡“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洩为内”，在认识上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汉书·艺文志》著录《尹文子》一篇，列名家。

黔娄 战国时齐国隐士。《汉书艺·文

志》记载：“守道不诎，威王下之”。他是一位品德端庄，言行不苟的道家学者，曾游学稷下。受到齐威王的礼遇，威王请他做官，他坚辞不就。后来鲁恭公也请他去鲁国，他拒绝了。死时衾不蔽体，他的妻子也是“乐贫行道”。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均记诵他夫妇安贫乐道的事迹。陶潜《咏贫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汉书·艺文志》著录《黔娄子》四篇，列入道家。

王蠋（？至公元前二八四年，）齐国画邑（今临淄朱台、桐林一带）人。他的事迹附列于《史记·田单列传》中。当齐湣王时，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二十九年佐赵灭中山；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同时为西帝）；三十八年伐宋，齐南割楚之淮北，而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三十九年，秦来伐；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燕将乐毅

遂入临淄……”。这是当时的一段连年征伐，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情况。王蠋早就鉴于祸福相依，物极必反的道理，知道齐国的危亡就在旦夕，屡谏齐王而不听，乃退居于野。乐毅入齐后，一再遣使礼聘，许之以封地，许之以爵位。但王蠋以“忠臣不事二主，烈士不嫁二夫”为矢志，而自经绝服为国殉难。墓在今召口乡东召口村东南一里许。

鲁仲连 战国著名辩士，齐国人。是稷下学宫最后一批先生。在十二岁时随同他的老师徐劫，辩倒了当时所谓“一日服千人”的名家学者田巴，人们称赞他为“千里驹”。而田巴则说他“岂只是千里驹，先生乃飞兔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他为人高洁，不肯做官，尝周游列国为人排忧解难。田单率数万大军围攻狄城三月不下，在他激励下，一举攻下了狄城，平定了内乱。《汉书·艺文志》著录《鲁仲连子》十四篇，今佚。另有清马国翰辑本，列儒家。

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他《咏史》诗中，高度赞颂：“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

军。当世贵不羈，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继，对珪不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唐代大诗人李白也以崇敬的心情写下了赞美的诗篇“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近代梁启超也评论说：“鲁仲连蹕蹕一书生，未尝与诸侯之政，未尝予军事，然观其折魏使，存赵国，其词令之间，一何凛然不可犯也。其权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圆满也”。“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抗日战争时间，陈毅同志在《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一诗中写道：“仲连智免蹈东海，武穆冤成走传车”，这些都是后人对他的赞扬和评价。至于田巴与徐劫，当是稷下人物无疑，但乏资料可寻，从略。

剧子 史书缺乏具体资料记载，《史记·索隐》按：“著书之人姓剧氏而称于也，前史不记其名也”。《史记·集解》徐广曰：“按应劭《氏姓注》直云“处子”也。《汉书·艺文志》著录《处子》九篇，注：赵人，

列法家。

尸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楚有尸子……”，《索隐》按：“尸子名佼（音绞），晋人，事具《别录》”。刘向《别录》：“楚有尸子，疑谓生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他的生卒时间，约在公元前三九〇年至公元前三三〇年之间，战国时法家，晋国人，一说为鲁国人。主张“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民，民莫不敬”。要求确定并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统治。《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注：鲁人名佼，商鞅师之。列杂家。

长卢 《史记·正义》记：“《长卢》九篇，楚人”。《汉书·艺文志》著录《长卢子》九篇，注：楚人，列道家，其他无记述。

吁子 《史记·索隐》“阿，齐之东阿

也。吁音举（颜师古云音弭）。《汉书·艺文志》著录《吁子》十八篇，注：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即孔门弟子之后）。列儒家。

墨翟（约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公元前三七六年）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大夫。早年学习儒术，因不满于“礼”，另立新学，成为儒家的一个反对派。他的“天志”、“明鬼”学说，不脱西周传统思想形式，但赋以“非命”和“兼爱”的内容，他反对儒家“天命”和“爱有差等”说，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其本人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的“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初步意识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并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

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当时的王公大夫，以改善劳动者、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他探究了关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提出了“非以重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他弟子很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子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为墨子后学所发展，而其中有关宗教迷信的形式，则为他们所克服。《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作者：王玉江同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副主任

刘文熙同志，退休教师

编 后

这辑《文史资料选辑》——稷下学宫专辑的编辑，是遵照《政协章程》第七条的规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精神，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编辑的。临淄是齐国的都城，是两千多年前稷下学宫的所在地，所以对这一历史资料的发掘、研究和探索，自然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先天条件。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区 and 全国一样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为发掘、研究和整理稷下学宫资料，纷纷撰写文章和召开专门讨论会议，都为我们的编纂工作，起了敦促和启导的作用。所以说这一专辑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的优越条件下产生的。

稷下学包含着各个不同学派，内容极为广泛。过去，由于封建社会“定于一尊”的思想禁锢，有关稷下的史料、著作甚少，现

下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实有相当难度。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有好多热爱祖国文化的同志，不畏困难，勇于探索，对齐文化展开了深入广泛地发掘、研究，并为我们撰写了文隽史实的珍贵篇章，对我们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这辑因篇幅所限，只收录文稿十二篇，约八万字。这些文稿多是学术性的历史考据文章，引古论今，连类取譬，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精辟的论证力。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和各学派的思想倾向，并通过对稷下人物的言行和一些细节的描述，别出新意，给人以清新隽永的感觉。不仅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而且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齐文化是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精神，概括说，就是“因应变革”，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在这全面体制改革的今天，研究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更有其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这个专辑，旨在“婴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借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让大家共同致力于齐文

化的发掘、研究和整理工作，发扬蹈厉，勇攀高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上，再出现一个更活跃、更兴旺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编者 谨启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